

海外雄飛——
高雄商業學校與日本南進政策*

歐素瑛

國史館修纂處纂修

摘要

1930 年代以後，日本加速推進其南進政策，臺灣成為日本的南進基地，為培養赴中國華南、南洋發展的商業人才，遂於 1937 年成立高雄商業學校。除招收臺灣島內學生外，還特別招收住在華南、南洋的日本人子弟，給予免試入學的優惠，並設置南方教育資金，助其求學，可說是高雄商業學校在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下，不同於其他學校的兩大特色，頗具特殊性。

日治之初，隨著日本國勢高揚，青年學子無不懷抱「海外雄飛」的願景來到殖民地臺灣發展。經數十載的耕耘，終於開花結果，不但開創個人事業成就，更將殖民地各項建設、學術研究推向高峰。此一「海外雄飛」的願景，隨著日本南進政策的推進，也令臺灣的青年學子躍躍欲試，高雄商業學校畢業生自不例外。況且，該校學生本就有不少來自華南、南洋，畢業後返回僑居地就業者亦多，教育成效突出。較之其他商業學校，可說有過之而無不及，重要性自不待言。

本文擬以高雄商業學校為中心，探究其創設緣由、教育目標、內容等與日本南進政策之關係，並與臺北、臺中等商業學校略作比較，藉期對日治時期臺灣商業教育之發展脈絡有更周延而完整的瞭解。

關鍵詞：高雄商業學校、雄商、海外雄飛、南進政策、戰時體制

壹、前言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計在臺設立 6 所中等商業學校，最早設立的是 1917 年的臺灣總督府商業學校（後改稱臺北商業學校，今國立臺北商業大學），1919 年再設立臺中商業學校（今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均係因應臺灣產業快速發展而培育所需的商業人才。其後 18 年間，未再創設商業學校。此一情況，頗令有識之士憂心，認為姑且不論日本國內的商業學校，單與另一殖民地朝鮮相比，其商業學校即多達 27 所（1935 年），而臺灣竟只有 2 所，實感貧弱。臺灣為日本帝國最南方的殖民地，位處日本本土與南洋之間，未來不論是往中國華南、南洋¹ 發展，或是推動各種產業的開發，在在都需要培育更多的商業人才，因此亟呼當局應增設商業學校，培育相關的人才。² 迄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臺灣隨之進入戰爭動員體制，軍事地位大幅提升，臺灣總督府為因應戰時體制及推進南進國策，遂大幅擴充實業教育，商業學校也由 2 所增為 6 所，且幾乎連續數年均新設商業學校，包括高雄商業學校（1937 年）、嘉義商業學校（1938 年）、彰化商業學校（1939 年）、新竹商業學校（1940 年）。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因應軍需資源和糧食需求的急速增加，總督府決定大幅擴充農業、工業學校，不再設置商業學校，甚至將嘉義商業學校、彰化商業學校改制為工業學校、新竹商業

* 本文為 107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海外雄飛——高雄商學校與日本南進政策」（計畫編號：MOST 107-2410-H-292-004-）之研究成果，論文初稿曾於 2020 年 8 月 21 日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主辦「第十一屆臺灣總督府檔案學術研討會」發表，感謝與談人鄭政誠教授之諸多指正。又，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許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1 按 1935 年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印之《臺灣と南支南洋》一書中，界定「南支」係指中國華南地區之福州、廈門、汕頭、廣東等日本領事館所轄區域。「南洋」係指以馬來群島為中心，包括菲律賓、英領婆羅洲、荷屬印尼、荷屬帝汶，以及法屬印度支那、暹羅、英屬馬來等。至於「南方」一語，則係 1941 年太平洋戰爭之後，日本對東南亞、南太平洋諸島的通稱。

2 小田梅吉，〈臺灣實業教育の四十年〉，《臺灣教育》，第 400 期（1935 年 11 月），頁 27-32。

學校改制為農業學校，³ 故商業學校實際為 3 所。顯示 1937 年以後，對於工商業人才的需求甚殷，而高雄位在帝國南端，為南臺灣第一大都市，也是南臺灣唯一的貿易港，具有港灣一切良好條件，加上總督府致力推動工業化，高雄儼然成為新興的工業都市，更是向南方發展的鎖鑰，因而首先在高雄設立商業學校，培育經略南方的商業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高雄商業學校除招收臺灣島內之臺、日籍學生外，還特別保留名額招收在華南、南洋的日本人子弟，不但給予免試入學的優待，減少其入學的困難；還設置南方教育資金，助其求學，俾其學成後返回住居地發展商業，扮演日本南進政策的尖兵。其後，更擴大招收南方各國的青年學生，使其因認識日本文化而親近日本。之所以特意招收這些住在華南、南洋的日本人子弟，除了推進南進國策外，也有其事實上的需要，一者因他們在住居地接受了初等教育後，因當地無日本人的中等學校可進，以致無法繼續升學，因而鼓勵他們來臺求學，解決其教育問題；二者因他們自小即生長於華南、南洋地區，對南方有一定的認識，加上其家人皆在南方定居，早已視南方為「第二故鄉」，其未來返回南方就業的可能性極高，因此只要施以相關的專業教育，再輔以時局教育、精神教育等，應可達到事半功倍之效。⁴ 由此可見，高雄商業學校之設立，完全是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而招收華南、南洋的日本人子弟、設立南方教育資金等，更是高雄商業學校獨有的特色，有其特殊意義。

目前關於日治時期商業教育之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高等商業學校，尤其是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戰後改為臺灣省立法商學院，1947 年併入國立臺

3 〈本島に於ける學校教育に關する非常措置〉，《臺灣時報》，1944 年 2、3 月號，頁 156-157。日治時期共計設立 23 所甲種實業學校，其中 17 所是在 1937 年以後密集設立的。1941-1945 年間設立的 8 所實業學校中，有 5 所是工業學校。

4 高雄商業學校編，《南方教育資金の現狀—御後援を仰ぐため》（高雄：高雄商業學校，1940 年 1 月），頁 1-2。

灣大學法學院)，⁵ 對高雄商業學校之研究尚付諸闕如。且據校方指出，第二任校長根來泰信於 1945 年 8 月終戰後，將學校一切歷史文獻資料燒毀殆盡，⁶ 以致相關文獻資料極為有限，研究備感困難。幸該校校友李明恭根據第二屆學生陳喜富提供之資料、照片，以及李明恭親自採訪校友、翻印史料，於高雄商業學校創校 70 週年之際編輯出版《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一書，蒐羅學校之沿革、平面圖、教職員及學科課程、學生制服、校友會暨海外生、文物史料等資料，略補校史資料燒毀之遺憾。高雄商業學校係 1937 年之後首先設立之中等商業學校，也是全臺第三所商業學校，與臺北、臺中商業學校分踞北、中、南三地，肩負著培育南方商業人才之重大使命，實有研究上之必要性與重要性。是故，本文擬利用《臺灣總督府檔案》、《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灣日日新報》、《高雄州報》，以及高雄商業學校編印之《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一覽》、《高雄商業學校諸規程》、《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令規》等文獻資料，以「海外雄飛」之概念，⁷ 探究高雄商業學校之創設、教育目標及內容等與日本南進政策之關係，並進一步評

5 關於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之研究成果如下：陳俐甫，〈臺灣與日本之學術「南進」——臺灣總督府、臺北高商、臺北帝大與日本東南亞研究的系譜〉，《臺灣風物》，第 47 卷第 3 期（1997 年 9 月），頁 161-167；陳俐甫，〈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沿革（1919-1947）〉，《臺北文獻》，直字第 95 期（1991 年 3 月），頁 81-97；橫井香織，〈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畢業生の動向に關する一考察〉，網址：

<http://repository.hyogo-u.ac.jp/dspace/bitstream/10132/2507/1/AA112829850080004.pdf>（2019 年 8 月 25 日點閱）；

橫井香織，〈旧制高等商業学校学生が見たアジア——臺北高等商業学校の調査旅行を中心に〉，網址：

<http://www.ritsumeit.ac.jp/acd/re/ssrc/result/memoirs/kiyou15/9out.pdf>（2019 年 8 月 25 日點閱）；渡辺邦博，〈臺北高等商業学校卒業生名簿作成に關する諸問題〉，《社会科学雜誌》，第 12 卷（2015 年 6 月），頁 37-49；

黑崎淳一，〈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與南支南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以及藤井康子〈1920 年代臺灣における臺南高等商業学校設立運動〉，《日本の教育史學》，第 48 卷（2005 年），頁 61-71 等。

6 〈校長張添庸序〉，收入李明恭編，《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屏東：李明恭，2008 年），頁 5。李明恭，1928 年生於屏東竹田，1949 年自省立高雄商業學校畢業，其後歷任屏東縣政府稅捐處民政科、民政局課員、三地鄉代理鄉長、高雄市政府民政局股長、視察、科長等職，著有《會議規範之說明及運用》、《竹田鄉史誌》、《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等書。

7 「海外雄飛」一詞，源自日本幕末經世學家所提出日本向外侵略擴張的理論，認為日本應跳出島國的侷限，「雄飛海外」，以避免在世界大勢中淪入落伍、滅亡之途；而本文係指高雄商業學校畢業生配合日本國策，遠赴南支南洋就業發展。東亞研究所，《日本大陸政策の發展》（東京：東亞研究所，1940 年）。

估臺北、臺中、高雄等商業學校之教育成效，藉期對日治時期臺灣商業教育之發展脈絡有更周延而完整的瞭解。

貳、高雄商業學校之創立及其發展

1895 年日本領有臺灣後，臺灣總督府參考日本明治維新所建立的新學制，正式將近代西式教育制度引進臺灣，開啟臺灣教育史的新紀元。同時，為統治及開發經濟利源，尤著重初等教育及初級職業教育，成果頗為可觀。⁸ 領臺之初，除了統治上最具實用的醫師培養機關外，至 1919 年全然沒有專科教育機關，實業學校亦付諸闕如；但為因應殖民地經濟開發之急需，相繼設置國語學校實業部、農事試驗場講習生制度、糖業講習所、殖產局工業講習所等，以臺灣人為施教對象，培養基層職業人力。⁹ 迄 1919 年 1 月總督府頒布「臺灣教育令」，確立臺灣人的普通、實業、專門及師範教育制度，但實業學校僅屬於日本的乙種 3 年制，學科程度亦低於日本國內的同級學校。¹⁰ 繼於同年 4 月頒布「臺灣公立實業學校官制」，據以整併舊有學校或新設學校，包括將原總督府工業講習所改制為臺北工業學校，新設臺中商業學校、嘉義農林學校。然而，因「臺灣教育令」未能滿足臺灣人長期以來的教育要求，甚至連日本國內開明之士亦覺不當而紛加指責，總督府遂於 1922 年 2 月公布修訂「臺灣教育令」，開放中等以上學校實施日臺共學，採行與日本國內相同的教育體制，並按「臺灣實業學校令」，將實業教育機關分為實業學校和實業補習學校兩類。其中，實業學校分為農、工、商業學校，修業年限延長為 5 年。¹¹

8 吳文星，〈始終未能與日人平等共學〉，《日本文摘》，第 100 期（1994 年 5 月 1 日），頁 81-90。

9 吳文星，〈日治前期臺灣職業教育之建立與資源之開發：以政策面之分析為中心〉，《第 3 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 年），頁 80。

10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 年），頁 425-426。

11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年），頁 93-97、112-117、890-893、903。

1930 年代中期以後，日本積極推進南進政策，臺灣成為日本的南進基地，位在南臺灣的高雄，更成為南進政策的策源地。惟過去高雄市的中等教育設施僅有中學校和女學校兩所，無法因應高雄市的急速發展，有不少市民及地方民眾只好將子弟送往外地求學。因此，增設中等學校，尤其是因應高雄市發展所需要的實業學校，乃成為官民一致的要求。1935 年輿論關於設校的討論趨於具體化，但因是時高雄急須推動的事業甚多，因而未獲實現。1936 年高雄州新設產業調查會，以州知事為會長，並派任 57 名委員，以應州知事之諮問及審議調查關於產業之事項。¹² 該調查會一方面就州下的產業規劃前瞻性的根本方策，並付諸討論；一方面成立南支南洋經濟的調查機關並提出因應措施。以此為目的，在高雄市設立商業學校，以順應南進國策、培育有為青年，殊有其必要。同年 6 月上旬，高雄州決定自翌（1937）年度設立商業學校，並提出教職員配置、由國庫編列預算，完成設立大綱。7 月，選定校址、設計校舍，且著手計劃。¹³ 另一方面，高雄州知事內海忠司¹⁴ 則率同內務部長高原逸人、教育課長土居美水等官員前往臺灣總督府，向小林躋造總督提出設校的要求；高雄市商工會、新興會、實業協會等各實業團體共同組織高雄商業學校設置期成大會，並推舉期成大會會長中村一造、商工會代表宮川精九郎、新興會代表井上亨，以及實業協會代表陳啟清等 4 人為陳情委員，於 7 月 27 日北上會晤文教局長深川繁治、總務長官平塚廣義等，向總督府當局提出高雄商業學校之設立陳情。¹⁵ 在各方的奔走努力下，12

12 〈高州產調會委員次會 知事說明內容〉，《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 年 6 月 4 日，第 4 版。

13 高雄商業學校編，《高雄商業學校諸規程》（臺北：高雄商業學校，1937 年），頁 1。

14 內海忠司（1884-1968），日本京都人，1911 年京都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政治科畢業。初曾任沖繩縣高等官、青森縣理事官、愛媛縣及佐賀縣書記官。1928 年改派遣來臺，任臺灣總督府臺北州警務部長，1929 年轉任臺南州內務部長、1931 年任臺北市尹、1932 年任新竹州知事。1935 年調任高雄州知事。至 1939 年退官，移住東京。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等編，《內海忠司日記 1928-1939—日本帝國的官僚與殖民地臺灣》（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2 年）。

15 〈高雄設商業學校 三實業團開大會 對府州市提出陳情書〉，《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 年 7 月 10 日，第 4 版；〈高雄商業設置請願的代表者出北 實行委員會で決定〉，《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 年 7 月 24 日，第 5 版；〈高雄商業設立陳情督府〉，《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 年 7 月 28 日，第 12 版。〈總督府

月，臺灣總督府通過 1937 年度預算 1 億 5,990 萬餘圓中，即包含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之校舍及其他新營費，共計 62,668 圓。¹⁶

之所以選在高雄設校，完全著眼於日本的南進政策，也希望能吸引住在華南、南洋的日本人子弟來臺就學。據學校當局所提出之理由如下：一是地理上的。高雄是位於臺灣南端的新興都市，除了冬季的 3、4 個月外，其他月份的平均溫度都與華南、南洋各地一樣，對於居住在華南、南洋地區的日本人子弟而言，來到高雄讀書、生活，不必擔心返回華南、南洋後會有不適應的問題；二是文化上的。高雄充斥著日本文化，日本內地的色彩濃厚，恰可扮演由華南、南洋來臺求學的日本人子弟認識日本文化的跳板。況且，近年來住在高雄的日本人的人數有明顯的增加，僅次於臺北，但就人口比率來看，日本人的比率則高於臺北。亦即，高雄市不只是一個殖民地都市，不只是一個貿易港、漁港，也是能控制廣大華南大陸的大工業港，在此港町設立一所商業學校，可以說是理所當然之事。設立高雄商業學校，一方面是為了高雄州、為了臺灣而設立；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實現日本帝國的南進國策而設立，是擔負國家重大使命的教育機關。因此，高雄商業學校雖然是一所州立學校，但不是高雄州所專有，而是在華南、南洋的日本人所共同擁有的國家設施，與島內所設立的各種學校有根本上的不同，是為了養成往海外發展的人才而設立的學校，¹⁷ 有其特殊的目的與使命。

確定設校之後，高雄州除致力於興建新校舍、延聘教職員、進行各項調查、準備外，在招生事務上，決定除招募臺灣島內的學生外，特別招募住在華南、南洋的日本人子弟。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因歐洲各國投入戰

を訪問して高雄商業設立陳情》，《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 年 7 月 28 日，第 1 版。

16 〈高雄州商業學校新築費〉，《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836002；〈督府の明年度予算最高記録を作る一億五千九百九十余万圓二十二日閣議で決定〉，《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 年 12 月 23 日。

17 高雄商業學校編，《南方教育資金の現状—御後援を仰ぐため》，頁 4-5。

場而景氣大好，農工及海運等產業皆出現未曾有過的擴張、新設，經濟成長快速，有不少日資企業、商品趁機進入華南、南洋市場，獲利甚多，進而掀起日本人前往華南、南洋的熱潮，主要居住在菲律賓、馬來半島及印尼等地。是故，在招生期間，除招募高雄州下、臺灣島內的日、臺籍學生外，也積極招募華南、南洋各地的日本人子弟。1937年1月9日，高雄州知事內海忠司特別向日本設在香港、馬尼拉（Manila，是菲律賓首都，位於菲律賓的最大島呂宋 Luzon 島馬尼拉灣的東岸）、納卯（Davao City，又稱達沃，是菲律賓南部民答那峨 Mindanao 島上最重要的城市，也是菲律賓第三大城）、新加坡（Singapore，又稱新加坡、星洲、星島、獅城、石叻等）、曼谷、泗水（Surabaya，位於爪哇島東北角，是印尼第二大城市）、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是印尼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位於爪哇島的西北海岸，曾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最重要的據點）等華南、南洋各地的駐在領事發出招生委任狀，請其推薦當地的日本人子弟來高雄商業學校就學。¹⁸

1937年2月，日本帝國議會通過新設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的預算。2月13日提出設立認可申請，3月31日獲准。4月1日，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今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以下稱高雄商業學校）正式創校，¹⁹ 招收尋常小學校、公學校6年畢業以及同等學力者，修業年限5年，是繼臺北、臺中商業學校之後臺灣的第三所商業學校。其校長人選，在當時頗受注目。由於是年3月間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校長切田太郎提出辭呈，預料全臺多所中等以上學校的人事將隨之異動，並預測新設的高雄商業學校校長應會由日本內地聘來；²⁰ 但之後並非如此。4月1日正式開校後，先由高雄

18 〈明年度開校の高雄商業學校 遠く南支、南洋からも入學志願者を募集 學校新設の重大使命に鑑み在外領事に人選を依頼〉，《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7年1月10日，第9版；高雄商業學校編，《高雄商業學校諸規程》，頁2。

19 高雄商業學校編，《高雄商業學校諸規程》，頁2。

20 〈高雄商業校長は内地より移入 高専では切田氏が勇退〉，《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7年3月24日，第1版；〈高雄商業校長移入 其他教界異動〉，《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7年3月24日，第8版。

州教育課長土居美水²¹ 暫代校長，並任命 2、3 名職員辦理創校相關事務。²² 4 月 5 日發表招生公告。4 月 10-12 日舉辦第一次入學考試。4 月 30 日，指派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教授河合讓為首任校長，5 月 5 日就任。²³

河合讓（1897-?），日本岡山縣人，為一虔誠的基督徒。1918 年自早稻田大學哲學科畢業後，旋於 1919 年赴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大學院深造，專攻哲學史。1921 年畢業後返回日本，歷任立教大學教授、廣島高等師範學校（今廣島大學）教諭等職，著有《心理學》以及〈經濟價値の構成原理研究〉、〈Bertand Russel: Education and the Special Order〉、〈學問の誕生——タレス（Thales, 624-546 B.C.，古希臘哲學家）の研究〉、〈杉村氏の「經濟哲學」〉、〈ノイマルク（Fritz Neumark, 1900-1991）の經濟政策論〉、〈リッケルト（Heinrich Rickert, 1863-1936）の追憶〉等文。1931 年來臺，任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講師，1932 年



圖 1 首任校長河合讓

資料來源：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第一回卒業生記念寫真帖》（高雄：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1942 年）。

21 土居美水，日本高知人，明治大學法科大學畢業。1929 年任臺北州警務部警務課警部補、1930 年任臺南州警務部警務課、理蕃課地方警視、1934 年任臺南州新營郡役所地方理事官、1936 年任高雄州內務部教育課地方理事官、1938 年任花蓮港廳庶務課地方理事官、1941 年任內務局地方課事務官、1942 年任外事部第二課書記官、1943 年任總督府外事部書記官、1944 年任外事部調查課書記官等職。在臺南州理蕃課任職期間，曾擔任高一學生就讀臺南師範學校期間的監護人。其兄長土居明夫曾為關東軍參謀、白團參謀。1944 年土居美水奉派接任臺北市長一職。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投降後，被遣返回日本。劉寧顏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土居美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2020 年 7 月 30 日點閱）。

22 〈土居美水高雄商業學校長事務取扱ヲ命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090006X003；〈土居美水高雄商業學校長事務取扱ヲ免ス〉，《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090072X003。

23 〈中等教育界の第二次異動 卅日附で發令さ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7 年 5 月 1 日，第 7 版。〈河合讓氏（高雄商業學校長）〉，《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7 年 5 月 6 日，第 5 版。

升任教授，講授修身、英語、德語、哲學概論。²⁴ 1937年4月，調任高雄商業學校校長。²⁵ 初期借用高雄中學校部分校舍上課，其後確定學校預定地在高雄市大港埔393番地（今高雄市新興區五福二路3號），面積15,712坪，總工程費25萬圓，預定興建5年完成，宿舍則先遷至西子灣苗圃內。1938年1月15日，舉辦地鎮祭，即開工前的奠基儀式，祈求工事順利，高雄州知事內海忠司、教育課長土居美水、教育課視學官三浦武治等官民皆出席與會。²⁶ 4月1日，宿舍遷回校內。²⁷ 5月14日上午10時，在高雄州青年會館（位於前金町愛河畔，今高雄市前金區，1930年6月落成，建築今已不存在）舉行開學典禮，高雄州知事內海忠司、高雄要塞司令官高品彪、內務部長高原逸人、高雄市長宗騰大陸、總督府文教局視學官鹿討豐雄，以及地方士紳等皆蒞臨與會，盛況空前。²⁸

河合校長來臺後，先任教於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前後7年。該校為臺灣商業教育的首創學府，也是最高學府，旨在培養南方貿易的第一線人才，除本科、研究科外，另設有貿易專修科、東亞經濟專修科，課程包含南支南洋經濟事情、南方資源論、南洋史、南方民族及社會事情等；也要求學生擇一修讀和蘭（荷蘭）語、馬來語、暹羅（泰）語、德語、法語、支那（中國）語等外語，²⁹ 在教育的形式或內容上均具有特殊性。課程之外，臺北高等商

24 〈河合讓任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教授〉，《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070010；〈河合讓任臺灣公立實業學校校長、敘高等官五等〉，《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090070X003；〈中等教育界の第二次異動 卅日附で發令さ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7年5月1日，第7版；〈河合讓氏（新任高雄商業學校校長）〉，《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7年5月4日，第2版。

25 〈河合讓新竹商業校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116a15 X 001。

26 〈高雄商業學校地鎮祭 きのふ嚴修さ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年1月16日，第5版。

27 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一覽：昭和14年》（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1939年），頁2。

28 〈高雄商業學校 十四日に開校式〉，《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年5月8日，第5版；〈高雄商業學校開校式 十四日舉行さ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年5月15日，第9版。

29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編，《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一覽》（臺北：臺北高等商業學校，1937年），頁21-27。

業學校每年都會舉辦臺灣島內、海外修學旅行，由教師帶領學生赴各地參觀教學。其中，海外修學旅行大多赴中國華南、香港、越南、新嘉坡、菲律賓、印尼等地。1936 年 7 月 6-29 日，河合讓也帶領學生後藤昭、泉喜久男等一行共 19 人前往菲律賓修學旅行，先經廈門再航向菲律賓，先後參訪馬尼拉、宿霧（Cebu City，位於菲律賓中部，是菲律賓宿霧省的首府，也是菲律賓第二大城）市、納卯等地之領事館、學校及商店街、事業機構等，尤以納卯的停留時間最長，主要參訪太田製麻工場、古川製麻工場、古川椰子工場、三井納卯木材會社等事業機構，讓學生對南洋地區的實況有更多的認識，收穫頗豐。³⁰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之任教經歷，對其後高雄商業學校之校務經營，有深刻影響。

1937 年 4 月，河合讓接掌高雄商業學校後，即參考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之課程設計，學生除修讀商業要項、簿記、商品、商業法規、商業實踐、國際金融、貿易經營等專業課程外，也修習南支南洋經濟事情、熱帶產業等與華南、南洋相關的課程；同時必須由暹羅語、馬來語、和蘭語、西班牙語、英語等語言中擇一進修，³¹ 顯示學校當局為配合南進政策，增列與南方各地相關的課程和語言，俾將來赴華南、南洋發展。相較之下，臺北商業學校的專業課程有商事要項、簿記、商品、商業文、商業算術、商業法規、商業實踐、商業英語、南支南洋經濟事情，以及支那語、馬來語，³² 與華南、南洋相關者僅最末 3 科；臺中商業學校的專業課程更少，包括商事要項、簿記、商品、商業文、商業算術、商業法規、商業實踐、經濟事情，以及支那語、馬來語，³³ 與華南、南洋相關者僅語言 2 科。至於稍晚創設的嘉義商業學校，

30 河合讓，〈フィリピン紀行〉，《南支南洋研究》，第 25 號（1937 年 2 月），頁 1-30。

31 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一覽：昭和 14 年》，頁 3-4。

32 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一覽》（臺北：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1940 年）。

33 臺中商業學校編，《臺中州立臺中商業學校要覽》（臺北：臺中商業學校，1939 年），頁 13-15。

其專業課程有商事要項、簿記、商業算術、商業法規、商品、商業文、商業實踐、支那及南洋事情，以及支那語、馬來語，³⁴ 與華南、南洋相關者也僅最末 3 科；以上 3 校之外語課程均僅有支那語、馬來語兩種，不若高雄商業學校之外語課程那麼多元，南方相關之專業課程亦明顯較少，由此可見高雄商業學校創設之特殊目的。

當然，高雄商業學校也如同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及其他學校一般舉辦島內、海外修學旅行，帶領學生赴各地參訪見習，河合校長更於 1941 年 7 月親率第一屆學生赴菲律賓修學旅行。1938 年 5 月，河合校長發行《南臺國策と商業教育》一書，闡述商業教育與日本南進政策之關係及其使命，指商業教育所培育之經貿人才應配合南進政策，前進華南、南洋。同年 6 月初，再赴南洋各地視察，前後 2 個月，遍歷爪哇、曼谷、新嘉坡、香港等地，對當地的風土民情、物產、經濟發展、教育狀況，以及日本人情形等，皆有不少觀察，更增益其南方認識。返臺之後，河合讓曾於報端發表在南洋視察之情況及感想，認為暹羅較親日，但對事變之宣傳明顯不足。³⁵ 而南洋各地的教育狀況普遍不佳，商業教育亦甚貧弱，其參訪泗水最好的一所商業學校後深感驚訝，認為該校尚稱不上是個教育機關，只能算是職業指導所而已。³⁶ 同年 11 月，在校內舉辦南洋展覽會，並經常應邀演講南洋與日本南進政策的關係等，³⁷ 藉著一系列的演講及展示活動，進一步提升學生及社會各界對南方事物及時局的瞭解。

34 〈臺南州立嘉義商業學校學科日課程及每週教授時數表〉，《臺南州報》，1938 年。

35 〈シヤムは親日 事變の宣傳不足を痛感した 南洋各地を視察して 河合校長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 年 8 月 20 日，第 5 版。

36 河合讓，〈南洋各地の教育状態〉，《臺灣教育》，第 435 期（1938 年 10 月 1 日），頁 49-55。

37 〈南洋事情講演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 年 10 月 14 日，第 5 版；〈南洋展覽會廿日商業學校で〉，《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 年 11 月 19 日，第 5 版；〈地方近事 時局講演と映畫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 年 1 月 19 日，第 8 版。

特別的是，為貫徹設校宗旨，在招生上亦與其他學校不同，除招募臺灣島內之臺、日籍學生外，亦積極招募在華南、南洋的日本人子弟，其任內制定「在外邦人入學規程」，每年保留 30 名免試入學名額給這些日本人子弟，一方面讓他們在小學校畢業後可繼續升學；二方面也有促進本島少年向華南、南洋發展的作用。³⁸ 其次，為免這些住在華南、南洋的日本人子弟因為經濟困難而中途輟學，自 1937 年創校起，即發起成立南方教育資金，助其求學，³⁹ 這也是第一個以「南方」為名的教育資金，得到財團法人南洋協會理事長林久治郎、日本糖業聯合會常任理事中瀨拙夫，以及高雄州知事內海忠司等人的大力支持，發起後兩、三個月之間，即募得 1 萬圓。此一招生暨南方教育資金的設置，也在海外獲致好評，有不少住在華南、南洋的日本人子弟提出入學申請，⁴⁰ 顯示該訴求不但符合臺灣總督府、日本政府的政策，也頗得到社會各界的認同。

此一特殊性，由高雄商業學校的校徽、校歌，也清楚可見。該校之校徽除了校名簡稱「雄商」之外，主要有兩個重要元素，上半部是一對展開的翅膀，取大鵬鳥翅膀之圖形，為展翅翱翔之意；下半部是海浪之圖象，為乘風破浪、衝破萬難之意。而由河合讓校長親自撰寫歌詞的校歌，最後一段高唱：



圖 2 高雄商業學校校旗

資料來源：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
《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第一回卒業生記念寫真帖》。

38 〈スラバヤから第二世達 胸躍らせて臺灣へ 高雄で上級學校に入學〉，《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 年 3 月 31 日，第 7 版。

39 〈財團法人にしたい 河合高雄商業學校長の談〉、〈第二世の生徒達を南方教育資金で救済 高雄商業に集つた佳話〉，《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 年 6 月 1 日，第 7 版。

40 河合讓，〈商業教育〉，《臺北ロータリー月報》，第 73 期（1938 年 10 月 22 日），頁 10。

對於艱鉅的遠航，振翼勿遲疑。
在浩天穹蒼飛翔，鵬鳥成群呀！
立志開拓大南洋，熱帶各島嶼。
抬頭仰望十字星，閃爍真璨爛。
讓我皇國的榮光，帶東亞共榮。
永久普照到環宇，每一個角落。⁴¹

由校歌之歌詞可見，其期許高雄商業學校的學生能懷抱「海外雄飛」的雄心壯志，扮演南進的先鋒，隨日本國勢之飛揚，前往華南、南洋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此時臺灣已處於戰時體制之下，學校教育充斥軍事氣氛，強調絕對服從，但河合校長獨倡民主自由之人格主義教育，要求教職員重視學生之人格教育，以鼓勵代替處罰，並以其座右銘「捨去自己的慾望和他人相處，尊重個人的性格及意願」與學生共勉，其認為應該尊重每一個人的性格及意願，以育成清晰、正直、強壯的新人才。同時，河合校長也著重智育、情操教育、德育、體育的均衡發展，在校內設置柔道、劍道、弓道、射擊、棒球、排球、庭球（網球）、田徑，以及美術、音樂、演劇、珠算、書道等社團，每週一、三、五為學藝社團日，二、四、六為體育社團日，鼓勵學生從事課外活動。另外，他也陸續建置各項制度，例如他向東京的樂器公司購買大型半音符 18 隻組成音樂管鐘，於每天朝會時演奏校歌，又興建購買會館，販售咖啡、文具用品，避免學生因出入市內咖啡店而挨罰，他也

41 1939 年 6 月河合讓校長撰寫的校歌歌詞如下：一、曙光初現的天空，晨霞紅遍天。仰望東昇的旭日，讚美歌誦它。滿懷希望的吶喊，希望的吶喊。回嚮於巍峨矗立，大武山巒峰。我們的青春活動，我們的生機。在校園裡迴盪著，瀰漫著永遠。二、壽山的瑞峰被掛，朝陽的旭光。陽光普照日靄靄，朝暈復夕陰。充滿光耀的擁抱，校園兮輝煌。切磋叨磨的功業，光輝燦爛哦。且看我們的努力，我們的精勤。正在校舍各角落，吐露著芬芳。三、對於艱鉅的遠航，振翼勿遲疑。在浩天穹蒼飛翔，鵬鳥成群呀！立志開拓大南洋，熱帶各島嶼。抬頭仰望十字星，閃爍真璨爛。讓我皇國的榮光，帶東亞共榮。永久普照到環宇，每一個角落。〈精神象徵—校徽校旗校歌〉，《雄商校友會》，網址：<http://teacher.ksvcs.kh.edu.tw/~history/C0204.htm>（2020 年 7 月 16 日點閱）。

同意學生在炎熱的天氣下穿著長褲可不紮綁腿，到校後再改換短褲、短襯衫等。⁴² 凡此均可見河合校長對校務經營之用心出力，也為日後高雄商業學校的飛躍發展奠定深厚的基礎。

1941 年 11 月，河合讓調任新竹州立新竹商業學校校長，改派根來泰信為高雄商業學校校長。⁴³ 根來泰信（1890-?），日本和歌山縣人，別號潤石。1912 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專攻支那文學。1915 年畢業後，進入三菱合資會社，奉命赴南北滿洲及上海視察，返日後即辭職，轉任東京女學館（今東京女學館大學）主事兼漢文科教授。1919 年 10 月來臺，1920 年任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教諭。⁴⁴ 1940 年 7 月任臺中州立臺中商業學校校長。⁴⁵ 1941 年 11 月調任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校長。根來校長到任後，高雄商業學校之學風丕變，尤著重團隊精神與軍事教育，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東亞局勢更趨緊張，於是將部分學科，如物理化學改授天文及火炮火藥等實用科目。1942 年 1 月 3 日，總督府以訓令第 1 號發布「學徒奉公隊規程」，將中等以上學校學生編入學徒奉公隊，要求學生參與戰技及防



圖3 第二任校長根來泰信
資料來源：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第一回卒業生記念寫真帖》。

42 李明恭，〈編輯人序〉、黃石澤，〈懷念創校首任校長河合讓〉，收入李明恭編，《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頁 1-2、94。

43 〈根來泰信氏（高雄商業校長）〉，《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1 年 11 月 18 日，第 4 版；〈根來泰信高雄商業校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116a15 X002；大園市藏，《臺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臺北：新時代社臺灣支社，1942 年），頁 72。

44 〈根來泰信任中學教諭、六ノ六、補臺北一中〉，《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080065；〈根來泰信（任臺灣公立實業學校長，四等）〉，《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106041X002。

45 〈根來泰信氏（新任臺中商業學校長）〉，《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0 年 7 月 14 日，第 1 版。

空訓練、糧食增產、陣地構築、軍事服務、神社清掃、探視病患及其他各種勞務工作。⁴⁶ 同時，學校當局亦鼓勵學生入伍從軍，許多學生未畢業即被征召入軍隊（迄 1945 年 3 月止，計有 47 名學生入營。其中，日籍生 37 名、臺籍生 10 名）。1941 年、1942 年、1943 年，總督府先後以府令第 210 號、第 235 號、第 295 號，規定實業學校的修業年限縮短 3 個月，⁴⁷ 俾學生早日畢業，提供戰爭所需人力。因此，學生都提早在 12 月份畢業。1943 年 2 月以敕令第 36 號頒布「中等學校令」，將修業年限由 5 年縮短為 4 年。⁴⁸

1943 年 11 月，盟軍飛機連續轟炸臺灣，新竹的日軍基地，飛機場、鐵路設施等均遭到猛烈轟炸。一個半月後，1944 年 1 月，盟軍飛機轟炸南臺灣的高雄、鹽水等地，太平洋上的戰火，終於延燒到臺灣島上。1945 年 4 月，高雄商業學校原定舉行第九屆入學考試，因盟軍飛機日夜轟炸而未能舉行，改依各國民學校所報學生成績表內申書決定入學許可，計錄取新生 100 名。惟未久校舍即被軍方徵用為兵舍，學生也被召集為學徒兵，授課完全停止。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戰敗投降時，根來校長將學校貴重物品出售，以協助日籍員工在被遣返回日本前的生活，並將學校文獻資料燒毀殆盡，⁴⁹ 以致相關文獻資料殘缺不全，留下歷史遺憾。

46 「學徒奉公隊規程」（1942 年 01 月 03 日），《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71034382a001；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東京：大空社，1998 年 9 月），頁 182-186。

47 「大學學部等ノ在學年限又ハ修業年限ノ臨時短縮ニ關スル件」（1941 年 10 月 28 日），《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1034325a003；〈實業學校修業年限ノ昭和十八年度臨時短縮ニ關スル件（府令第二三五號）〉，《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495002；「大學學部等ノ在學年限又ハ修業年限ノ昭和十九年度臨時短縮ニ關スル件」（1943 年 12 月 25 日），《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72030520a002。1937 年入學的第 1 屆學生，因修業年限縮短 3 個月，而於 1941 年 12 月畢業。同樣的，1938 年、1939 年入學的第 2 屆、第 3 屆學生，分別於 1942 年 12 月、1943 年 12 月畢業。

48 「台湾教育令中ヲ改正ス」，〈公文類聚・第六十七編・昭和十八年・第一卷・學事一・學制・教育費〉，國立公文書館藏，檔號：A03010140800。1940 年、1941 年、1942 年入學的第 4 屆、第 5 屆、第 6 屆學生，因修業年限由 5 年縮短為 4 年，分別於 1943 年 12 月、1944 年 3 月、1945 年 3 月畢業。

49 李明恭，〈編輯人序〉，收入李明恭編，《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頁 2。

叁、師資與教學活動

高雄商業學校的教師大致可分為教諭、囑託兩種，教師皆學有專精，師資素質頗佳。創校之初，教職員除了校長、書記、校醫之外，正式教師只有林政市⁵⁰、並河達雄、五十嵐嘉行⁵¹、佐渡理三郎⁵²等 4 名教諭，師資略顯單薄。次（1938）年，教諭增為 7 名。1939-1944 年教諭的人數分別為 10 名、12 名、15 名、18 名、5 名、19 名；⁵³除了 1943 年因應戰爭需求，總督府決定將部分商業學校改為農業、工業學校，一律整頓並縮小規模，遂大幅縮減教諭名額為 5 名，其餘年度基本上呈逐年遞增之勢，師資陣容日趨堅強。

表 1 高雄商業學校教諭一覽表

姓名	籍貫	學歷	經歷	任職時間、擔任科目	備註
林政市	和歌山	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文科第一部	1933 年任高雄高等女學校囑託、1934-1936 年任高雄高等女學校教諭	1937-1939 修身	1941-1942 年轉任新竹師範學校教諭、1944 年任臺南師範學校預科
佐渡理三郎	富山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東洋史學專攻	1934 年任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局臨時雇	1937-1939 歷史	1933 年畢業論文〈宋代の都市研究〉。1940 年死亡

50 〈林政市任臺灣公立實業學校教諭、敘高等官七等〉，《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090068。林政市，和歌山縣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文科第一部畢業。1932 年來臺，任高雄高等女學校囑託、教諭，1937-1940 年任高雄商業學校教諭，1941 年轉任新竹商業學校教諭，講授修身教育。

51 〈五十嵐嘉行（任臺灣公立實業學校教諭、俸給、勤務）〉，《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265a35。五十嵐嘉行，富山縣人，早稻田大學高等師範部國語漢文科畢。歷任石川縣立小松中學校教諭、富山縣立富山中學校教諭。1937 年來臺，任高雄商業學校教諭。1940-1941 年任花蓮港廳廳立花蓮港工業學校教諭。

52 佐渡理三郎，富山縣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畢業後，於 1934 年任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局臨時雇，1937 年任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教諭。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934 年、1937-1939 年），頁 158、669、712、765。

53 整理自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39-1944 年逐年數據之統計。

海外雄飛——高雄商業學校與日本南進政策

姓名	籍貫	學歷	經歷	任職時間、擔任科目	備註
並河達雄	兵庫		-	1937	
五十嵐嘉行	富山	早稻田大學 高等師範部 國語漢文科	-	1937	1940-1941年轉任花蓮港廳立花蓮港工業學校教諭
國枝龍一	熊本	臺灣總督府 高等商業學校	1924-1925年任臺南商業補習學校助教諭、1926-1937年任臺中商業學校教諭	1938-1944 修身、簿記	著有《作歌の態度》、《政體論》、《この大戦果》、《九月あらたま集評》、《社會教育宣傳筋書—臺南市臺南商業補習學校》以及短歌《七月集》、《草原漫步》、《大和順禮》等多首
佐藤文一	岩手	早稻田大學、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	1933年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副手、1934-1937年任屏東高等女學校教諭	1938-1940 修身、英語	1932年畢業論文《シェーの恋愛詩に現はれたる美的幻影と其根元》、另著有《高砂族原始藝術研究》、《臺灣府誌ニ見ル熟蕃ノ歌謠》、《臺灣原住種族の原始文學概觀》、《パイワン族の歌謠に就て》、《大社庄の蕃歌》、《高砂族身體裝飾研究》、《臺灣原住種族の原始文學概觀》等文 1941-1944年轉任臺北帝國大學豫（預）科教授
今村四郎	福岡	第八臨時教員養成所	1930-1937年任嘉義農林學校教諭、1934年兼臺南州鹿麻產公學校教員心得、1935	1938-1940 數學	1941年轉任屏東中學校教諭兼屏東師範學校囑託。著有《名嘉山氏に詫びる文》及短歌《三月

姓名	籍貫	學歷	經歷	任職時間、 擔任科目	備註
			年兼臺南州新港 公學校教員心得		集)、〈四月集)、〈十 月集)等多首
松山壽	千葉	日本大學高 等師範部	1936-1937任臺中 家政女學校教諭	1938-1944 漢文、支那 語	
長谷安生	石川	臺灣總督府 臺北高等商 業學校理甲 、東北帝國 大學法文學 部	1937年任文教局 編修課雇	1938-1941 英語	著有〈幸助の買ひ もの)、〈身邊近 況)、〈大東亞戰爭) 等文。 1939年2月至1941 年2月應召服役
安藤覺	福岡	日本體育協 會體操學校	1934-1935年任臺 南師範學校囑託 、1936-1937任高 雄中學校囑託	1937-1940 體操	1941年轉任臺南第 二中學校教諭
平川豐	熊本	臺北帝國大 學理農學部 生物學科	1931年任臺北第 三高等女學校囑 託、1932-1938年 任同校教諭	1939-1944 博物	1931年畢業論文 〈Synoekologische studien ueber diestrandflora der insel formasa)、另 著有〈高雄の紅樹 林)、〈教育の反省) 、〈(工藤祐舜)先 生を偲びて)等文
岩石正夫	佐賀	早稻田大學 商學部	1930-1935年任臺 北帝國大學附屬 圖書館雇、1936- 1938年任同館司 書	1939-1944 商業要項	1939年任高雄商業 學校囑託、1940- 1944年任教諭
古田穰	東京	慶應義塾大 學文學部		1939-1942 商業英語	1939年任高雄商業 學校囑託、1940- 1942年任教諭。 1944年轉任宜蘭農 林學校教諭

海外雄飛——高雄商業學校與日本南進政策

姓名	籍貫	學歷	經歷	任職時間、擔任科目	備註
富田朝男	佐賀	東洋大學專門部		1939-1944 國語、劍道	
井上二郎	兵庫	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1930年任臺中地方法院檢察局雇、1932-1933年任總督官房法務課雇	1940-1944 公民、西語	
柴田憲也	山形	早稻田大學文學部	1932-1935年任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雇、1937-1939年任同館司書	1940-1944 國語	1940年任高雄商業學校囑託、1941-1944年任教諭
山口義熊	宮崎	高松高等商業學校	1932年任宮崎縣西諸縣郡小林中等公民學校助教諭心得兼西諸縣郡小林尋常高等小學校代用教員、1934-1938年任營林所庶務課雇、1940年任營林所羅東出張所屬	1940-1944 級任	
阪野勇	福岡	青山學院英語師範科	1940年任高雄商業學校囑託、1941年任同校教諭	1940-1941 英語、音樂	1942年轉任高雄中學校教諭
前田岩樹	長崎	日本體育協會體操學校	-	1941-1942 體操	
土岐昇	福島	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部電氣工學科	1933年任警務局保安課屬兼臺北州警務部高等警察課警部、1934-1935年東石郡役所警察課警部、1938年任新化郡役所警察課警部	1941 物理、化學、數學	1942-1943年轉任高雄中學校囑託兼高雄工業學校教諭

姓名	籍貫	學歷	經歷	任職時間、 擔任科目	備註
			、1939-1940年新竹州知事官房調停課屬、1941-1942年任新竹州總務部調停課屬		
佐藤孝	新潟		1939-1940年任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雇	1941-1942	
石井秀夫	山口		-	1941-1944	著有〈現象學派の哲學のために〉、〈哲學的周邊〉等文
穴野勝仁			-	1941-1942	
波多野久男	滋賀	陸軍中尉	-	1942-1943	1944年轉任高雄中學校教諭
下橋忠孝	京都		1929年任臺中高等女學校教諭	1942-1944 級任	
高添多喜男	佐賀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國史學專攻	-	1942-1944 歷史	1941年畢業論文〈清朝に於ける臺灣の荒政に就て〉
島村謙	東京		-	1942-1943	1944年轉任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教諭
佐佐木鶴佐	佐賀		1937-1938年任臺北市宮前公學校訓導	1942-1944 級任	
前田津與次	佐賀		1934年任臺北州柑園公學校教員心得、1935年任臺北州羅東女子公學校教員心得、1936-1939年任同校訓導	1942-1944	
桐野一雄	岡山		1929-1936年任臺南第一中學校教諭	1942-1944 級任	1942年任高雄商業學校囑託，1944年任教諭

姓名	籍貫	學歷	經歷	任職時間、擔任科目	備註
竹田泰三	靜岡	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本科	1937-1939年任鐵道部經理課雇、1940-1941年任澎湖廳庶務課屬	1942-1944級任	1942年任高雄商業學校囑託，1944年任教諭
藤島見了	熊本	龍谷大學文學部英文科	1927年任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教諭、1928-1931年任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教諭、1932-1942年任高雄高等女學校教諭	1943-1944英語、級任	
相野一雄			-	1943	
川口福七			-	1943-1944	
崎田進			-	1944級任	
大柳千代丸			1940年任高雄商工專修學校囑託、1941-1942年任同校教諭	1944級任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灣總督府府報》、《高雄州報》。

由表 1 可見，高雄商業學校的教諭共計 35 名，全是日本人，絕大多數的教師在擔任高雄商業學校教諭之前，均已具有教學經驗，其或來自島內其他商業學校，例如校長河合讓是由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調任，修身科、簿記科教師國枝龍一原為臺中商業學校教諭。⁵⁴ 或為南高屏地區學校轉任，例如英文科教師藤島見了曾任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教諭、高雄高等女學校教諭，

54 〈國枝龍一任實業學校教諭、七等八級、補高雄商業學校教諭〉，《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093097。國枝龍一，熊本縣人，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畢業。1924 年任臺南商業補習學校助教諭、1926 年任臺中商業學校教諭，1938 年任高雄商業學校教諭，教授修身、簿記。

1943 年轉任高雄商業學校教諭，⁵⁵ 教學經驗頗稱豐富。又，由於河合讓校長畢業自早稻田大學，也延攬不少位早大畢業生來校任教，例如五十嵐嘉行、佐藤文一⁵⁶、土岐昇⁵⁷、岩石正夫、柴田惠也等皆是。其他大學畢業生亦復不少，例如佐藤文一於早大畢業後來臺，進入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英文科），1933 年畢業後，先任屏東高等女學校教諭，1938 年轉任高雄商業學校教諭。佐渡理三郎、高添多喜男均畢業自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平川豐畢業自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生物學科；而井上二郎⁵⁸ 畢業自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歷任臺中地方法院檢察局雇、總督官房法務課雇，1940 年獲聘為高雄商業學校教師，顯見師資來源相當多元。

部分教諭還兼任學生宿舍南溟寮之舍監。高雄商業學校之學生主要來自高雄州，但也有部分學生遠從其他地區前來就讀，尤其是來自華南、南洋的學生，故校內有宿舍供學生住宿，並由教師兼任舍監管理其日常生活，例如並河達雄、國枝龍一、松山壽、長谷安生、平川豐、富田朝男、井上二郎、穴野勝仁、波多野久男等，均曾兼任舍監。不過，教師之任期普遍不長，長者約 7 年，短者 1 年，平均任期約 3 年。倘以 1941 年為界，1941 年之前有教師 17 名，平均任期約 4 年，1941 年之後有教師 18 名，平均任期約 2 年。又，有部分原擔任囑託者，後改聘為教諭，例如岩石正夫、古田穰、柴田惠

55 〈藤島見了（任高女、高雄）〉，《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113001X002。藤島見了，熊本縣人，龍谷大學文學部英文科畢業。曾任龍谷中學校教諭。1927 年來臺，任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教諭。1932 年任高雄高等女學校教諭。1943 年轉任高雄商業學校教諭。

56 〈佐藤文一（任臺灣公立實業學校教諭、敘高等官七等、八級俸下賜，補高雄商業學校教諭）〉，《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101099。佐藤文一，岩手縣人，早稻田大學英文科畢業。1923 年來臺，1930 年入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文學科（英文科），1933 年畢業。1934 年任屏東高等女學校教諭、1938 年任高雄商業學校教諭，教授修身、英語。1941-1944 年轉任臺北帝國大學預科教授。

57 〈土岐昇（任實業學校教諭）〉，《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110A38。土岐昇，福島縣人，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部電氣工學科畢業。曾任福島縣立磐城高等女學校教諭心得、教諭。1941 年任高雄商業學校教諭。1942 轉任高雄工業學校教諭兼高雄中學校囑託。

58 〈井上二郎（任屬；免官）〉，《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10241021。

也、阪野勇、桐野一雄、竹田泰三等均是。教師流動之原因，主要是轉到其他學校任教，也有部分年輕教師被徵調往戰場，導致教師流動加劇、師資不足等問題。

上述教師除了有若干研究論著外，亦有不少位教師雅好文學，以吟詠和歌、短詩為樂，例如國枝龍一、今村四郎、長谷安生等均是。國枝龍一的筆名是「邦枝隆」，加入あらたま短歌會，並發表短歌於該會歌誌《あらたま》（按：あらたま是璞、新珠、新玉之意）。《あらたま》係 1922 年 11 月由濱口正雄、八重潮路（樋詰正治）等人創刊，迄 1945 年 8 月終戰才停刊，與 1921 年創刊的俳誌《ゆうかり》（尤加利，1921-1945），被文學批評家島田謹二譽為日治時期「臺灣文藝雜誌的兩橫綱」。⁵⁹ 國枝龍一喜歡南方壁虎的叫聲，曾寫道：「以波浪的聲音和壁虎的叫聲來感覺季節的變遷」。他也愛鳳凰木，曾寫道：「霧深的早晨，公園鳳凰木葉子昨夜散落一地」。其以短歌吟咏臺灣四季風情、自然風光，頗具特色。⁶⁰ 而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之淡水寮校，也是由國枝龍一作詞。

另外，由於學校甚重視語言教育，學生除必修英語之外，尚須擇一修讀暹羅語、馬來語、和蘭語、西班牙語、支那語、英語等外語，因此也延聘了不少語言教師，例如佐藤文一、井上二郎、阪野勇、藤島見了等都是英語教師、松山壽為支那語教師。除了日籍教師授課外，學校當局也自國外延聘合適的教師講授馬來語、德語、法語等，例如馬來語教師ラーテンマス・スウカンタル氏（Lartenmouth Sukanthal）是蘭印（荷屬東印度，今印尼）爪哇人，在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英文科求學期間，曾在淺井惠倫教授的推薦下赴日本遊學，畢業後獲聘為高雄商業學校馬來語教師；イラワン・ライチ

59 陳黎，〈後記二／臺灣四季，詩歌一事〉，收入陳黎、上田哲二譯，《臺灣四季：日據時期臺灣短歌選》（臺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 年）。

60 邦枝隆，〈臺南〉，《あらたま》（1926 年 6 月號），頁 8。

イーブ氏 (Irawan Latip) 自巴達維亞的中學校畢業後，進入荷蘭的 Voorschoten 商業專門學校就讀。畢業後，再赴德、法等國留學，不但具有語學專長，閱歷亦甚豐富。他們到高雄商業學校任教後，對於擴展學生的海外視野及外語學習，均有極大的助益。⁶¹

相較之下，稍晚成立的嘉義、彰化、新竹商業學校之師資，似較高雄商業學校薄弱。其中，1938 年創校的嘉義商業學校有校長 1 名、教諭 4 名，以及兼任教諭 1 名，校長井芹善藏擔任修身、歷史、武道等學科，教諭兼教務主任野野山次郎擔任理科、圖畫、地理 3 科，教諭兼學級主任石川寬次郎擔任國語 1 科，教諭高橋祐之擔任英語、音樂 2 科，教諭永瀨象助擔任體操、教練、武道等 3 科，數學則由兼任教諭中村昇一擔任。其後，1939-1942 年教諭的人數分別為 7 名、12 名、15 名、17 名；1943 年教諭驟減為 3 名，⁶² 1944 年總督府進行決戰下的教育整編，將嘉義商業學校改為嘉義工業學校。而 1939 年創校的彰化商業學校有校長松田郁太郎 1 名、有福友好、森貞麿、廣瀨清士、土屋文雄等教諭 4 名，其後，1940-1942 年教諭人數分別為 6 名、9 名、11 名。1943 年教諭驟減為 2 名。1944 年彰化商業學校改為彰化工業學校。又，1940 年創校的新竹商業學校有校長 1 名、教諭 3 名，校長光永美紀擔任修身，教諭兼教務主任青田重忠擔任理科、地理、圖畫、作文，教諭兼學級主任長谷川忠雄擔任英語、數學，教諭兼學級主任中谷義信擔任國語、漢文、歷史、習字。1941 年教諭增為 4 名，增聘松本良隆擔任國語、漢文 2 科。1942 年教諭有 10 名。1943 年驟減為 4 名，⁶³ 1944 年新竹商業學校改為新竹農業學校。

61 〈高商招聘の教師は 立志傳中の篤學者〉，《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 年 12 月 7 日，第 5 版。

62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938-1943 年）。

63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940-1943 年）。

表 2 高雄商業學校囑託一覽表

姓名	籍貫	學歷	經歷	任職時間、擔任科目	備註
田中文吉	和歌山	陸軍步兵少尉	1934年任高雄州旗山第一公學校訓導	1937 教官	1944年轉任臺南師範學校配屬將校
瀨名波信德	廣島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1928年任宮崎縣立病院醫員、1929年12月來臺，1930年任澎湖廳警務課警察醫兼澎湖廳馬公婦人病院囑託	1937-1944 校醫	1937-1938年任高雄商業學校校醫，1938-1944任囑託
村上信生	福岡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農學科	1932-1933年任臺南州斗六公學校教員心得	1938	1939年轉任宜蘭農林學校教諭、1941年任蘭陽高等女學校教諭、1944年任嘉義農林學校教諭
進藤末治	秋田		1937-1944年任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教諭	1938	
河本貢	廣島		1937-1944年任高雄中學校教諭	1938	
岩崎千藏	岡山	岡山縣師範學校	1939年任高雄中學校、高雄商業學校囑託（唱歌）	1939 音樂	1940年任高雄中學校、高雄高等女學校教諭、1941年任高雄高等女學校教諭、高雄中學校囑託、1944年任高雄第一高等女學校教諭
橫山精一	新瀉	臺灣總督府臺南中學校、明治大學專門部商科	1929-1938年任高雄州內務部勸業課產業書記、1939年任高雄州商工獎勵館產業書記	1939-1940 圖畫	

姓名	籍貫	學歷	經歷	任職時間、擔任科目	備註
大井司	宮城	仙臺醫學專門學校醫學科	1913-1919年任臺中醫院醫官兼臺中中學校囑託、1920-1924年臺南醫院醫官、1925-1926年任花蓮港醫院醫長、1928-1930年任嘉義醫院醫長、1931-1932年新竹醫院醫長、1933年任高雄醫院醫長、1935-1938年任臺南師範學校囑託	1939-1940 校醫(內科)	1939-1944年任高雄中學校校醫。著有〈臺灣赤痢及療法に就て〉等文
田中公平	廣島	洗心中學館 陸軍少尉		1939-1942 教官	
戴榮輝	新竹	臺灣商工學校		1940 珠算	
肆矢高明	愛知			1940-1941	
日野一久	和歌山			1940-1941	
宮田吉信	大阪			1940-1941	
大木市藏	福岡		1932-1935年任高雄中學校囑託	1940-1944 柔道	1940-1944年任高雄州警務部警務課囑託、兼高雄商工專修學校囑託
杉田美智治	宮崎	國學院大學 高等師範部	1930年任鐵道部運輸課雇	1941 國語、歷史	1942年轉任臺南師範學校教諭，1944年升助教授
竹田榮次	新竹			1941-1944	
春日清彥	長野		1938年任高雄市堀江尋常高等小學校教員心得、1939-1949年任同校訓導	1941-1944	1941年任高雄商工專修學校助教諭；1942、1944年任淑德女學校助教諭；1944年兼高雄第二高等女學校囑託

海外雄飛——高雄商業學校與日本南進政策

姓名	籍貫	學歷	經歷	任職時間、擔任科目	備註
社本武雄	愛知		1940年任高雄中學校囑託、1941-1942年任同校教諭	1942	1944年任高雄中學校教諭
村井大三	靜岡		1941-1942年任高雄州商工獎勵館囑託	1942	
廣津武夫	山口	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博士	1936-1937年任臺北醫院醫官補、1938-1939年任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助手、1940-1941年任鐵道部庶務課囑託、1942-1944年任高雄醫院醫官	1942 校醫	1944年博士論文〈「夏期熱」ニ關スル研究〉。另著有〈假性小頭症に就て〉、〈幼兒に於ける「チフス」性肝膿瘍の症例〉、〈週期性嘔吐症に血尿を再度反覆せる症例〉、〈夏期熱の研究〉等文
上野源五	熊本		1917年因精通土語獲任臺中廳巡查、1930-1932年任高雄醫院雇、1932-1938年任高雄中學校囑託、1939-1941年任高雄中學校雇	1942-1944	
吉田丞雄	富山	東京音樂學校撰科（唱歌科）	1902年任東京市淺草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1903年任奈良縣師範學校教諭、1919年任奈良縣宇智郡五條町立五條商業女學校教諭、1920-1921年任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教諭、1923-1932年任彰化高等女學校教諭、1933-1934年任同校囑託	1942-1944 音樂	1942年任高雄中學校囑託

姓名	籍貫	學歷	經歷	任職時間、擔任科目	備註
齋藤正	東京		1928-1930年任中央研究所衛生部雇、1931-1939年新竹州警務部衛生課衛生技手、1940-1941年臺南刑務所高雄支所囑託	1942-1944	1944年任臺南刑務所高雄支所、高雄商工專修學校囑託。著有〈臺灣青少年團結成に於ける團長式辞〉等文。
德永義雄			1936-1937年任高雄中學校囑託、1939年任高雄市湊青年學校囑託、1939-1940年任高雄市堀江青年學校囑託、1941-1944年任高雄市堀江青年學校指導員、1942年任高雄工業學校囑託	1944	
顏萬預	澎湖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	1918-1919年任澎湖廳湖西公學校訓導、1920年任澎湖廳媽宮公學校教諭、1921年任高雄州小池角公學校教諭、1922-1925年任同校訓導、1928-1929年任小池角公學校竹篙灣分教場教員心得、1930年任小池角公學校內坂分教場教員心得	1944	生卒年1899-1975。著有〈臺灣芝居に對する所感を讀んで〉、〈教育上の誠〉、〈或る教育者に與へた手紙の一節〉等文
雲林院祥次	滋賀	滋賀縣師範學校第一部	1911年任滋賀縣蒲生郡玉緒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1919年任日野町立田野實科高等女學校教諭、1920年任滋賀縣日野高等女學校教諭、1922年來臺，任高雄第一尋常	1944 修身	著有〈高雄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行啓の御模様並に感想〉等文

姓名	籍貫	學歷	經歷	任職時間、擔任科目	備註
			高等小學校教諭、1924-1944年任高雄高等女學校教諭		
三村稔	廣島	廣島高等師範學校文科	1929年任熊本縣立中學濟濟覺教諭、1934年任下關商業學校教諭、1938-1942年任臺中第一中學校教諭、1943-1944年任高雄第二高等女學校教諭	1944 地理歷史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灣總督府府報》、《高雄州報》。

由表 2 可見，高雄商業學校的囑託人數不少，共計 27 名。囑託為非正式之職員，係因應教學或校務需要而聘雇之人員，例如田中文吉、田中公平為軍事教官、瀨名波信德、大井司、廣津武夫為校醫、吉田丞雄為音樂老師等。值得注意的是，最初高雄商業學校之軍事教官均是囑託，1942 年才聘陸軍中尉波多野久男為教諭，可見隨著戰爭愈加急迫，是時之學校教育強調軍國主義，軍訓課程成為重要的教學科目之一。況且，除校內課程外，尚有各種軍事訓練、軍事檢閱、高雄州中等學校聯合軍事演習等，不斷強化軍事技能。又，也有鄰近學校或機構相互支援的，例如進藤末治、河本貢、岩崎千藏、社本武雄等為高雄中學校教諭或囑託；雲林院祥次為高雄高等女學校教諭、三村稔為高雄第二高等女學校教諭，均同時擔任高雄商業學校囑託，以補師資之不足。其中，岩崎千藏為知名的作曲家，1941 年高雄市制定的「高雄市民歌」，即是由日本詩人野口雨情作詞、岩崎千藏作曲，由名聲樂家藤山一郎、二葉明子及伊藤久男、菊池章子演唱。⁶⁴

64 〈「高雄歷史常設廳」5/12 開幕，歡迎民眾參觀認識港都文化〉，《臺灣商會聯合資訊網》，網址：<https://www.tcoc.org.tw/articles/20040512-f5e652ac>（2020 年 7 月 15 日點閱）。

另外，學校當局也會延聘州下具實務經驗之人員到校任教，例如高雄州商工獎勵館產業書記橫山精一、囑託村井大三等。其中，橫山精一（1898-?）是日治時期活躍於高雄的畫家，其畫作主要在描繪高雄港都風情，作品曾 12 度入選臺灣美術展覽會，亦曾參與日本的獨立展，深獲肯定。1925 年，他與高雄中學校美術教師山田新吉在高雄婦人館舉辦高雄洋畫展覽會，吸引了 2,000 多名觀眾入場，反應熱烈。除了美術家的身份外，橫山也是一位推動產業活動的公職人員。橫山自 1929 年起擔任高雄州內務部勸業課產業書記，1939 年任高雄州商工獎勵館產業書記。⁶⁵ 高雄州商工獎勵館成立於 1938 年，係因應高雄成為大型工業港，並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而成立的商工推廣機構，除了一般商品陳列的功能外，還負責華南、南洋事情的調查研究、舉辦各種南方事情講習，以及產業美術及發明相關的調查研究等。同年，該館成立產業美術協會，旨在辦理工藝、商業美術相關調查研究、接受委託製作工藝品及圖案設計，以及舉辦研究會、演講會、講習會、競技會、展覽會等，橫山亦獲聘為理事。⁶⁶ 亦即，橫山兼具產業與美術之專長，符合高雄商業學校之需要，因而獲延聘到校教授圖畫。至於戴榮輝、顏萬預兩人為臺灣人。

按 1937 年 4 月 18 日高雄州令第 6 號頒布「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學則」之規定，一、二年級學生須修讀修身、公民科、國語（日語）、數學、地理歷史、理科、英語、圖畫、音樂、體操等基礎科目，三、四、五年級學生必修商事要項、簿記、商品、商業法規、南支南洋經濟事情、商業實踐等專業科目。另外，四年級時必須由暹羅語、馬來語、和蘭語、西班牙語、英語等 5 種語言中擇一進修，時數 3 小時；五年級時必須就國際金融、貿易經營、

65 王子碩，〈產業與藝術雙棲者——港都的橫山精一〉，《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網址：<https://chenchengpo.dcam.wzu.edu.tw/showNews.php?aid=158>（2020 年 7 月 15 日點閱）。

66 高雄州商工獎勵館編，《高雄州案內》（高雄：高雄州商工獎勵館，1938 年），版權頁；〈產業美術協會高雄州に創設さ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8 年 8 月 16 日，第 5 版。

熱帶產業等 3 科目中擇一進修，時數 2 小時。⁶⁷ 以語言選修為例，第二屆 79 名選修語文課的學生中，有 26 名選修英語、20 名修支那語、18 名修西班牙語、15 名修馬來語。但到第三屆學生時，96 名學生中，修馬來語 36 名最多，次為英語 23 名、再次為支那語 21 名、西班牙語 16 名。⁶⁸ 1937 年 9 月，臺灣總督府頒布「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綱要」，透過各種思想宣傳與精神動員，實施徹底的同化及振興國民精神，學生除不斷被動員參與勤勞奉仕（勞動服務）、神社參拜、國防獻金、皇軍慰問等活動外，平日也被灌輸徹底的國體觀念、倡揚興亞的理想、善導對中國的認識、普及軍事知識等，並將上述理念編入教材中。由於高雄商業學校特別收容在華南、南洋定居的日本人子弟，為使其具有徹底的日本精神，除了修身、公民等科目外，也以國漢、國史為重點，以涵養其國民精神。⁶⁹ 由於教授之科目多達 53 種，也著重各科之間橫向的連結，例如修身和國語、國語和博物、國語和歷史、博物和地理、數學和簿記、一般地理和商業地理、一般歷史和商業史、地理和南支南洋經濟事情等，⁷⁰ 重新編排成具連貫性、體系化的教材。學生如能進行華南、南洋相關研究，學校當局還會頒給研究獎勵。

又，高雄商業學校頗重視學生的體育活動，部分學生在體育方面頗有特出成就，例如 1940 年全臺中等學校野球（棒球）大會中，第一屆學生大下弘（1922-1979）⁷¹ 擔任投手，投出完封比賽，打敗臺中商業學校，第二場

67 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令規》（臺北：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1939 年 7 月），頁 6-9。

68 李明恭編，《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頁 105-114。修讀英語，未來可赴菲律賓、新加坡（新加坡）發展；修讀西班牙語，可赴菲律賓發展；修讀馬來語，可赴馬來半島各國發展；修讀支那語（華語）可赴中國華南等各地發展。

69 高雄州勸業課編，《高雄州產業概觀》（高雄，高雄州勸業課，1938 年 10 月），頁 55-56。

70 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令規》，頁 6-9。

71 大下弘（1922-1979），日本神戶市人。父親過世後，因母親在臺灣的海軍設施開設料理店，遂於 1936 年隨母親移居高雄，1937 年考入高雄商業學校，為該校棒球隊王牌與首任打者。1942 年錄取明治大學商科而返日就讀，1943 年進入陸軍航空士官學校服役至戰爭結束，1945 年復學但旋即退學。1946 年加入日本職棒，為有名的打擊王，也是日職復興後的首批人氣球星。1959 年季後宣布引退，1979 年 5 月 23 日因服

對戰嘉義農林學校，擊出大會第一支全壘打，最後雖敗給嘉義農林學校，但也將高雄商業學校的名聲帶到最高點。⁷² 又，大下弘在野球隊成立之前，與第二屆學生陳喜富都是田徑隊的主力選手，大下弘專長短跑、標槍，曾寫下臺灣中等學校標槍紀錄，而陳喜富則專長 100 公尺短跑，曾兩度赴日本參加明治神宮國民鍊成大會，是少數曾代表臺灣參與這項盛事的體育好手。⁷³ 1941 年，陳喜富先參加由臺灣總督府主辦的地方預賽，田徑即陸上競技（包含賽跑、跳高、跳遠、撐竿跳、鐵餅等項目），在百米競賽中，以 11.1 秒獲得全臺中等學校第一名。同年 10 月，代表臺灣隊參加第 12 屆明治神宮國民鍊成大會，在陸上競技賽中獲得佳績。1942 年 10 月升上五年級後，陳喜富再度獲選拔參加第 13 屆明治神宮國民鍊成大會，在陸上競技賽項目的 4 人 800 公尺接力賽中，獲得全日本第三名的優異成績，轟動日本體壇，日本《朝日新聞》並予以刊載。⁷⁴ 可惜的是，因比賽期間適值冬季，天氣較為寒冷；加上長途航程，以致比賽成績不盡理想，但能以優異成績代表雄商，代表臺灣，兩度參加明治神宮國民鍊成大會，確是一件相當引以為傲的事蹟，也成為陳喜富一生難忘的經驗與回憶。⁷⁵

用大量安眠藥身亡，享年 56 歲；1980 年入選日本野球殿堂。著有《大下弘日記——球道徒然草》。桑原稻敏，《青バットのボンちゃん大下弘：伝説に彩られた天才打者の実像》（東京：ライブ，1989 年）。

72 〈嘉農傳統の猛攻に 高商守備陣總崩れ〉，《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0 年 7 月 24 日，第 8 版；〈高雄商業勝つ 南部中等野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0 年 10 月 27 日，第 8 版。

73 李明恭編，《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頁 78。

74 〈“よくぞ”と沸く拍手 闘志滿滿臺灣選士團の入場〉，《朝日新聞》，大阪，1942 年 10 月 30 日。

75 陳喜富，〈明治神宮國民鍊成大會參加の光榮〉，收入李明恭編，《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頁 81-89。明治神宮國民鍊成大會係以緬懷明治天皇的德澤、國民的身體鍛鍊及精神的鼓舞為宗旨。在每年 11 月 3 日明治節時，利用祭祀天皇的同時，舉行競技運動大會，並將比賽成果奉獻給天皇，由於比賽場地在明治神宮外苑的競技場，因此也稱為「明治神宮競技大會」。自 1924-1943 年，共舉辦 14 回。第 1、2 回由內務省主辦，第 3 至 9 回由明治神宮體育會主辦，第 10 至 13 回由厚生省主辦，第 14 回只進行了地方預選。參加者有青年團及一般（含學生）。青年團由道府縣單位選出；一般由北海道、東北、關東、北陸、東海、近畿、中國、四國、九州、臺灣、朝鮮、關東州等 12 個地域進行預選後選出。運動項目包括集團體操、陸上競技、水上競技、野球、硬式網球、足球、橄欖球、曲棍球、籃球、排球、划船、相撲、柔道、劍道、弓道、射擊、桌球、自行車、騎馬等。入江克巳，《昭和スポーツ史論——明治神宮競技大會と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東京：不昧堂，1991 年）。

再者，高雄商業學校自創校不久，即開始舉辦修學旅行，使學生從實地參觀和調查中獲得學習。基本上，是以跨年級的方式辦理，由各年級分別辦理。就旅行地區而言，大致可分為臺灣島內修學旅行、海外修學旅行兩種。前者主要參觀臺灣島內具特色的自然景觀、名勝古蹟、公共設施等。後者則按學校當局所頒訂「旅行積立金（旅行基金）規程」，預定於四年級時實施日本內地旅行、五年級時實施華南、南洋旅行。因此，每位學生自入學起，即每月收取 5 圓（1937 年度入學生每月收 3 圓，1938 年以後入學生每月收 5 圓），1 年計收 60 圓，5 年共計收 300 圓。其中，80 圓用於赴日本內地旅行，220 圓用於赴華南、南洋旅行，不足的部分由學生補足，但海外生由校內南方教育資金及其存款利息等經營資金支出。⁷⁶ 不過其後因為戰爭的緣故，僅於 1940 年舉辦四年級生赴日本內地修學旅行、1941 年舉辦五年級生赴南洋修學旅行。其後，因戰爭愈趨激烈，修學旅行僅限臺灣島內。茲略分述如下：

一、島內修學旅行

一般學校所舉辦之島內修學旅行，大都是由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屏東，再返回臺北，由北而南，或由南而北，遍歷臺灣西部景點，為期約 5 天。但高雄商業學校所舉辦之島內修學旅行，大都約 1-2 天，旅行路線及地區大都在臺灣中、南部，除了參觀各地著名的寺廟、名勝古蹟、自然景觀之外，也會特別各地的神社參拜，可說是修學旅行的一大重點。1934 年臺灣總督府提出「一街庄一神社」的廣建神社方針，開始在全臺各地大量增建神社。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更大力推動神社參拜活動，各級學校及青年團、保甲壯丁團、婦人會等團體須於每月 1 日、8 日、15 日赴神社參拜，參

76 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一覽：昭和 14 年》，頁 22-23。旅行積立金，係為旅行而積存的錢，即旅行積金。

拜日不限於例祭日，其他節日、或學校的修學旅行、畢業旅行等也會安排參拜活動，高雄商業學校自不例外，幾乎所有學生都會被安排赴高雄神社參拜，⁷⁷ 顯然是學校當局配合皇民化政策而安排的行程。



圖 4 第二屆新生參拜高雄神社

資料來源：〈雄商校友會〉，網址：

<http://www.kcsalumnus.com.tw/00index-dv.htm>。

又，由現存的少數照片中，可見學生必去參訪的景點之一是阿里山。在臺灣南部的景點中，最著名者莫過於阿里山，是許多學校修學旅行的必到之處，並與著名的紅檜巨木合影留念。⁷⁸ 1906 年日籍技師小笠原富次郎發現這棵阿里山區最大的紅檜巨木，從此聲名遠播，被稱為阿里山神木。1912 年阿里山森林鐵路通車後，每當火車經過此地，遊客都會對這棵巨木留下深刻印象。1927 年，阿里山入選臺灣日日新報社徵募之「臺灣八景」之一，為臺灣南部最具代表性的地標之一。除了神木之外，搭乘森林火車，看日出、雲海、沿線的森林景觀，以及鄰近的神社、學校、阿里山寺等名勝，使學生認識臺灣的自然、社會文化及特色。

77 高雄神社源起 1910 年設於壽山下的打狗金刀比羅神社，主祀大物主命與崇德天皇，1920 年高雄州政府向臺灣總督府申請增祀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並於同年 12 月更名為高雄神社。1926 年高雄神社取得壽山山腰七千餘坪官有土地，展開募款遷建工程，1928 年 4 月開工，1929 年落成，1932 年列格為縣社，正式列入日本國家神道系統。〈高雄市忠烈祠及原高雄神社遺跡〉，《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historicalBuilding/20071221000001> (2020 年 7 月 10 日點閱)。

78 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第一回卒業生記念寫真帖》。



圖 5 第六屆學生畢業旅行，參觀阿里山神木

資料來源：〈雄商校友會〉，網址：<http://www.kcsalumnus.com.tw/00index-dv.htm>

二、海外修學旅行

海外修學旅行只舉辦兩次，兩次參與的學生都是 1937 年第一屆入學的學生。第一次是 1940 年 6 月 4 日的四年級生赴日本內地修學旅行。第二次是 1941 年 7 月 10 日至 8 月 3 日的五年級生南洋修學旅行。

（一）第一次內地修學旅行

第一次海外修學旅行是 1940 年 6 月 4 日的四年級生赴日本內地修學旅行。由現存照片來看，此次修學旅行主要前往關東、關西之著名景點、名勝古蹟等。首站抵達東京，先赴東京中心的皇居，並在二重橋前合影留念；也參訪明治神宮暨外苑聖德紀念繪畫館，館內主要陳列明治天皇相關事蹟的壁畫共計 80 幅，藉此對明治時代的歷史一目了然。接著，到東京近郊的江之島、鎌倉。湘南海岸一帶早在明治時期就已規劃成海水浴場，且因離東京近、風景怡人，一直是著名的旅遊盛地。其中，江之島位在片瀨江流入相模

灣的出海口，是一座面積約 0.4 平方公里的陸連島，名列日本百景之一，學生也在此眺望秀麗的海景。而一旁的鎌倉為歷史古都，擁有為數眾多的名勝古蹟，著名的地標鎌倉大佛及古寺長谷寺都在此，學生當然不免俗地與高達 11 公尺的鎌倉大佛合影留念，也在長谷寺留影。最後，是到關東地區北部的日光，通過著名的神橋後，參訪供奉江戶幕府初代將軍德川家康（1543-1616）的神社東照宮，內有出自大師之手的五彩彫刻，令人嘆為觀止，學生也在入口處與鳥居、東照宮合影留念。之後，轉往關西地區，參訪大阪天守閣、京都嵐山、春日神社、奈良東大寺、伊勢神宮、二見ヶ浦夫婦岩等地，⁷⁹ 都是日本具特色的自然景觀、名勝古蹟等，使學生對日本的歷史文化有更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此次旅程前後約 10 天，不論就旅行時間、地點而言，都較一般學校所舉辦之內地修學旅行時間較短、參觀景點較少，⁸⁰ 亦未參觀銀行、企業等商業教育相關機關，可能因此時已際戰爭時期，故縮減修學旅行之時間、地點所致。



圖 6 在鎌倉大佛前留影

資料來源：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第一回卒業生記念寫真帖》。

79 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第一回卒業生記念寫真帖》。

80 一般赴日本內地修學旅行之行程，概由下關、神戶、大阪、奈良、名古屋、鎌倉、橫濱、東京、日光、東京、京都、廣島，前後約 20 天。臺灣時代社教育部編，《臺灣教育事情》（臺北：臺灣時代社教育部，1937 年），頁 107-111。

（二）第二次南洋修學旅行

1941年5月，高雄商業學校向臺灣總督府提出該校五年級生為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擬組團前往南洋修學旅行之申請，旋獲得許可。此次修學旅行，由河合讓校長親自帶隊，率岩石正夫、井上二郎等2名教諭，以及第一屆學生35名（內有臺籍生2名），預定於7月6日搭乘商船がんちす丸赴南洋各地見學，前後約1個月時間。⁸¹

事實上，自1941年起，日本與美、英等國之關係日益緊張，戰爭似有一觸即發之勢，於此之際前往南洋修學旅行，安全堪虞；但高雄商業學校仍決定按計畫行事。6月26日，河合校長率同2名教諭、35名學生組成訪菲（律賓）學生視察團到臺北，當晚住在朝陽號旅館，接受臺灣日日新報社的訪問，27日再搭夜車返回高雄。此次訪談中，河合校長指出：

本次來到臺北，是針對我與2名職員帶領本校35名學生搭乘7月6日的便船前往菲律賓之事進行討論。由於太平洋風浪甚大，本來有點擔心是否可以成行，不過菲律賓移民局非常盡心盡力，還為我們作出種種特別安排，讓我們可以在約4週內遍遊馬尼拉、宿霧、納卯、碧瑤。視察團員中有2名出身納卯，可以回鄉應該會讓他們非常開心。各位南進青年是未來的人才，背負著大展鴻圖的期望，所以這次的參訪團與一般的參訪團有所不同，當地應該會提供工作機會，給予青年活躍的機會。菲律賓承受著日、美戰爭的威脅，不過當地的同胞（按：指日本人）都有抗戰到底的決心，非常值得信賴。許多婦孺已經撤退，不過現在日本人已經不能再後退了。商業方面也應該抱持著不惜付出代價的準備，繼

81 〈高雄商業學校て 修學旅行團派遣 南方圏を語る前に 正しい現地認識 マニラを中心に見學〉，《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1年5月19日，第4版。

續和平發展。菲律賓人一向畏戰，當地的美國人也不樂於參戰，我認為這次我們參訪菲律賓可以提高菲律賓民眾的親日感，以學生純直的交流，使他們了解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日本。本校準備向 71 名有父兄在南支南洋的本國子弟提供南方資金，助其求學，不過看來人數還會逐漸增加。向南方發展的青年日增，我感到喜不自勝。⁸²

7 月 10 日，南方見學團一行獲高雄州知事坂口主稅⁸³ 接見，並勉勵指出：「諸君是將來日本南進的尖兵，期待大家未來都能大活躍，並趁這次的機會，好好地觀察、體會帝國南進國策，使這次的旅行特別有意義。」當天見學團一行並前往高雄神社參拜，祈求旅途順利。晚間 6 時，即搭乘商船がらんちす丸自高雄港出發，航向馬尼拉。⁸⁴ 迄 8 月 3 日，訪菲視察團一行在視察了馬尼拉、宿霧、納卯之後返回臺灣，前後約 3 週時間，較原定參訪 4 週，少了 1 週。

菲律賓是個擁有 7,100 多個島嶼的南洋國度，素有「千島之國」美稱，原為西班牙殖民地，1898 年因與美國戰爭失敗而轉讓美國。此次視察團一行所到的馬尼拉、宿霧、納卯，分別是菲律賓群島北、中、南部的三大城市，也是菲律賓第一、二、三大城市，不但是重要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中心，也是重要的交通和貿易港口。1903 年前後，因菲律賓殖民政府的勞力需求，日人大量湧入，迄 1937 年在菲律賓的日本人數已多達 14,000 人左右，是東

82 〈親日使節の役も帯び 若人ら南方視察 高雄商業生徒ら比島方面へ〉，《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1 年 6 月 28 日，第 3 版。

83 坂口主稅（1899-1981），日本熊本縣人，1923 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畢業，旋即來臺，任臺灣總督府屬、事務官。1927 年任臺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課長兼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附屬博物館館長、事務官。1939 年 1 月任臺中州內務部長。1941 年 5 月接任高雄州知事。1943 年 11 月接任臺北州知事。劉寧顏編，《重修臺灣省通志》。

84 〈知事の激勵を受け 憧れの南の旅へ 昨夕南方視察團高雄出發〉，《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1 年 7 月 11 日，第 4 版。

南亞日籍移民人數最多的地區；同時，在臺灣總督府為補助華南、南洋企業發展而編列的「南支南洋施設費」中，除了補助貿易外，也補助文化設施及其他華南、南洋的相關事業。在南洋地區，獲得補助金額最多的就是菲律賓，主要是對馬尼拉麻（Manila hemp）、椰子栽培業者的補助，補助的企業絕大多數是日資事業，⁸⁵ 也補助馬尼拉的日本人小學校、醫院，補助範圍遍及商業貿易、學校、醫院等。



圖 7 在馬尼拉化學館前留影
資料來源：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第一回卒業生記念寫真帖》。

訪菲視察團一行之參訪行程，其實與 1936 年 7 月河合讓擔任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教授期間帶領學生參訪菲律賓的行程類似。首站抵達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曾與馬尼拉日本人小學校進行校歌交換，使其親近日本文化，也參訪了黎剎公園（Rizal Park）⁸⁶，並與公園內的黎剎紀念碑（Bantayog ni Jose Rizal）合影留念。另外，也參訪了菲律賓科學局（Philippines. Bureau of Science）位在馬尼拉的化學館。菲律賓科學局是菲律賓主要的研究中心，在農業、食品加工、林業，以及醫藥等研究上，均卓有成就，其化學館更號稱是東洋第一，因此特別前往參觀。接

85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4 年 12 月），頁 162-163。

86 黎剎公園（Rizal Park）是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一個公園，位於羅哈斯大道（Roxas Boulevard）旁，鄰近馬尼拉灣。該公園是為了紀念菲律賓民族英雄黎剎（Jose Rizal，1861-1896）於 1896 年 12 月 30 日為爭取菲律賓脫離西班牙殖民統治時就義的事件；黎剎被處決後被埋葬在此處。1913 年，菲國政府在公園內豎立黎剎的雕像及紀念碑，碑文寫著：「紀念荷西·黎剎，愛國者和烈士，1896 年 12 月 30 日在 Bagumbayan Field 處決。此紀念碑由菲律賓群島的人民敬獻。」〈黎剎紀念公園 菲必遊勝地〉，《東方日報》，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824/00176_021.html?pubdate=20100824（2020 年 7 月 18 日點閱）。

著，赴菲律賓第二大城宿霧。該城係 1521 年 3 月西班牙航海家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1480-1521）以西班牙之名在此插下基督教十字架，成為西班牙在東方的殖民地，因此街景、建物均充滿西班牙風情。視察團一行參觀了宿霧港、宿霧日本人商店街，並搭車登上宿霧市的制高點布塞山頂觀景臺，眺望整個宿霧市區。最後，於 7 月 20 日轉赴菲律賓最南端民答那峨島上最重要的城市納卯，在當地從事馬尼拉麻栽培的日本人多達 18,000 人，光日本人小學校就有 13 所之多，視察團一行參觀了納卯的碼頭、日本人商店街，以及位在菲律賓第一高峰阿波山（Mount Apo，海拔 2,954 公尺）上、有「納卯開拓之父」美譽的太田恭三郎⁸⁷ 紀念碑等。行程頗為緊湊、豐富，除了參觀菲律賓具特色的自然景觀、名勝古蹟、公共設施外，尤其著重日本人在菲律賓的各項設施及活動，對其未來前往南方就業、發展，裨益甚大。

8 月 3 日晚間一行人返抵基隆港，河合校長也發表此次修學旅行的感想指出：

睽違 5 年再訪菲律賓，最強烈的感受是雖然菲律賓也進入了戰時狀態，但大家進美國領事館卻沒有遭到盤查，在移民官的協助下，只看學生的臉和團體旅行卷就放行，很快地上陸了，不願與日本交流的菲律賓就這樣讓學生順利視察，非常歡迎學生的到來。在戰時狀態下，居然能得到這樣的歡迎，令人相當意外。國人開設的商店裡，除了日本商品外，還混雜著美國便宜的劣等品，至少有兩位數之多，根據當地國人所言，最近來自日本的商品都

87 太田恭三郎，於 1901 年渡航馬尼拉，在那裡經營日本雜貨的進口業務。之後轉往納卯，並創設太田興業株式會社，統籌馬尼拉麻的耕作販賣，納卯也因此發展成為南洋一帶日本人最集中的地區。同時，恭三郎還為日本人提供了學校、醫院，開闢道路、港口等，因而獲譽為「納卯開拓之父」。之後，在菲律賓第一高峰阿波山上為他豎立紀念碑。星篤比古，《先驅者：ダバオ開拓の父・太田恭三郎伝》（東京：誠美書閣，1942 年）。

進不來，所以只能出此下策，實際上美國商品對日本商品造成很大的壓力，從泰國到馬來亞、蘭印（荷屬東印度，即今印尼）最近一年來有大量的美國商品流通，其根據地即為菲律賓。可見菲律賓的戰時狀態物資非常短缺。一般的情況都持續惡化，但各地的國人都能泰然處之。我認為現在開始有必要從文化方面大力推動未來的對菲策略。本次的旅行中，我們這裡的日本人團體斡旋後，明年畢業生的就職大致上已經全部內定了，之後回國的狀態稍微有些令人擔心，但我們必須抱持著在允許的範圍內逐漸發展、開拓事業的志向。⁸⁸

岩石正夫老師補充指出，「我最初不過是嘗試辦理（畢業生）就職，不過出乎意料地，各界的申請蜂湧而至，令人驚訝。帶來的學生無法回應所有的申請，僅僅半數的申請，馬尼拉 12 名、納卯 23 名便全部內定完成，全都是一流的商店。」⁸⁹ 可見此次修學旅行不只是見學參訪、觀光旅遊、皇國思想的灌輸，也趁著前往南方之便，試探畢業生前往就職的可能，結果出乎意料之外的好，顯示學校當局致力於落實設校宗旨，促使學生站在南方國策的第一線，在海外活躍發展。一行人於 8 月 3 日返抵基隆，自基隆車站搭乘夜車返回高雄。

此次修學旅行，也是 1937 年入學的第一屆學生的畢業旅行，讓學生在進入職場之前更加正確地認識和掌握南洋地區的實況。不過目前僅見校長、教師所發表的感想，未見學生的旅行記錄或心得，其想法如何，實不得而知。他們返回臺灣後不久，1941 年 11 月河合讓校長調任新竹州立新竹商業學校

88 〈土産は南方の認識 高雄商業生徒一行比島から歸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1 年 8 月 4 日，第 3 版。

89 〈土産は南方の認識 高雄商業生徒一行比島から歸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1 年 8 月 4 日，第 3 版。

校長，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先後攻陷香港、吉隆坡、馬尼拉、新嘉坡、荷屬東印度巴厘島、爪哇島、仰光等地，勢如破竹；但 1942 年 6 月中途島戰役後，局勢急轉直下，日軍節節敗退，喪失在太平洋戰場的戰略主動權，而美國則掌控了日本附近海域的制海權、制空權。之後，航行於臺、日、華南、南洋之間的船隻經常遭到美國潛艇的魚雷攻擊，基於安全考量，高雄商業學校未再舉辦海外修學旅行。

肆、學生入學與就業狀況

高雄商業學校與其他中等以上學校一樣，學生以日籍生居多，臺籍生入學不易。以第一、二、三屆學生為例，臺籍生約占近 3 成，日籍生約占近 7 成，臺、日籍生之比例頗為懸殊。又，學生主要來自高雄州，高占約 89.6%；高雄州外約占 7.9%；島外的福州、廈門、漳州、汕頭經試驗入學者約占 2.5%。另有來自福州、廈門、漳州、汕頭、香港、馬尼拉、宿霧、納卯、新嘉坡、爪哇之無試驗入學者，如將島外試驗入學及無試驗入學生合計，則海外生約占 1 成之多。⁹⁰ 可見該校雖以南進之名而成立，但學生還是以高雄州的日籍生占絕大多數，似乎是讓日籍子弟多了一所中等學校可以入學而已。其父兄之職業，近 5 成是從事商業（包括貿易商、雜貨商、物產商、洋服商、食料品商、飲食店、旅館等）；其次是公務、自由業 30%（包括會社員、官吏、醫師、教員等），再次是農業、水產業 15%，工業 6%，最少的是其他有業者 2%。父母的教育程度以小、公學校畢業者最多，其次是中等學校畢業。第一屆招生時，除臺灣島內考生外，來自納卯、廈門、香港等華南、南洋地區的志願者亦多，人數多達 646 名，為預定錄取人數的 6 倍半之多，競爭十分激烈，形同「試驗地獄」。⁹¹ 最後錄取 93 名，錄取率約

90 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一覽：昭和 14 年》，頁 6。

91 〈南支、南洋からも 入學志願者が殺到 六倍半といふ試験地獄を現出〉，《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7

14%。第二屆的志願者有 373 名，不到第一屆志願者的 6 成，錄取 91 名，錄取率升高為 24%。第三屆招生時，因高雄州下增設 2 所州立學校，志願者再降為 224 名，錄取 95 名，錄取率高達 42%，⁹² 幾乎是第一屆錄取率的 2 倍。至第四屆時，志願者回升為 407 名，錄取 81 名，錄取率降為 20%。⁹³ 1941 年第五屆招生時，同樣有 400 多名志願者爭取進入高雄商業學校的「窄門」，這次入學考試的題目為「南方發展為何」等非常時局下國民所關心的問題，希望能測驗學生對現下時局與日本南進國策的重要性，以及對高雄商業學校的特殊意義之了解。⁹⁴ 由於辦學績效頗佳，校譽遠播，有不少志願學生是在其遠在南方經商的親友推薦下報考高雄商業學校的。⁹⁵

至於海外生，分為試驗入學、無試驗入學兩種，第一屆共招收 11 名（試驗 1 名、無試驗 10 名），第二屆 12 名（試驗 5 名、無試驗 7 名），第三屆 7 名（試驗 4 名、無試驗 3 名），⁹⁶ 不但與預定每年招收 30 名的落差頗大；且部分海外生於入學後，常因學資不足，或因家族遷移、轉學、疾病、死亡等而退學。經學校當局調查後，發現這些海外生的父兄中有約三分之二的經濟受到中日戰爭、世界經濟不景氣的重大衝擊，因而影響及學費的供給，延遲 2、3 個月繳交的還好，延遲半年以上的也不少，甚至經學校一再催繳，也無力繳交，因此由南方教育資金予以援助，使這些海外生得以安心求學。

⁹⁷ 此舉果然在海外獲致好評，有不少海外日本人子弟提出入學申請，1940

年 4 月 9 日，第 5 版。

92 〈各中等學校合格者／高雄商業入學者〉，《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 年 3 月 28 日，第 8 版。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一覽：昭和 14 年》，頁 6。

93 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一覽：昭和 15 年》（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1940 年），頁 6-7。

94 〈“南方發展”とは何？ 高雄商業の學識考查〉，《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1 年 3 月 24 日，第 4 版。

95 黃石澤，〈懷念創校首任校長河合讓〉，收入李明恭編，《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頁 94。

96 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一覽：昭和 14 年》，頁 7。

97 〈財團法人にしたい 河合高雄商業學校長の談〉、〈第二世の生徒達を南方教育資金で救済 高雄商業に集つた佳話〉，《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9 年 6 月 1 日，第 7 版。

年第四屆招生時，海外生的申請人數大增至 24 名（包括納卯 3 名、泗水 3 名、新嘉坡 3 名、婆羅洲 1 名、廣東 5 名、汕頭 1 名、廈門 6 名，以及香港 2 名）。⁹⁸ 總計全校共有海外生 47 名，其中來自菲律賓的有 11 名、廈門 10 名、爪哇 7 名，以及新嘉坡、香港、福州、汕頭等地，⁹⁹ 校譽頗盛。是（1940）年 4 月，日本拓務大臣小磯國昭（1880-1950）在結束「南支慰問」後，順道訪問臺灣。23 日，到高雄視察製鋁工場所在的戲獅甲及草衙工業區一帶後，特別赴高雄商業學校參訪，由校長河合讓報告學校的沿革、現況等，小磯拓相對學校的各項設施表示非常滿意。¹⁰⁰ 其後，日本政府為實踐其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大力鼓勵住在華南、南洋的日本人子弟和南方各國的青年學生來臺就學，每人每月給予 30-50 圓補助費。其中，日本人子弟除補助大學 1 名、專門學校 1 名、商業、工業、農業學校各 5 名、中學校 2 名外，加上補助高雄商業學校海外生 30 名，共計 49 名。南方各國青年學生則補助大學 1 名、專門學校 1 名、高校 1 名、商業、工業學校各 5 名、中學校 2 名，共計 16 名。¹⁰¹ 1941 年第五屆招生時，海外生仍有 24 名（包括廈門 5 名、香港 1 名、汕頭 6 名、廣東 5 名、菲律賓 2 名、婆羅洲 3 名、爪哇 2 名）；加上校內的 47 名海外生，共計 71 名。這些學生因在非常時局下無法赴日本國內求學，但可進入高雄商業學校就讀，經施以培育南進戰士的特種教育後，日後可站在南方國策的第一線，在海外活躍發展。¹⁰²

相較之下，臺北、臺中、嘉義、新竹等商業學校之學生以來自臺灣島內各州廳為主。以嘉義商業學校為例，1938 年第一屆招生 100 名（內地人 61

98 〈高雄商業學校 海外で好評 本年は二十四名入學〉，《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0 年 3 月 27 日，第 5 版。

99 〈海外で好評の高雄商業校 在學生は四十七名〉，《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0 年 4 月 24 日，第 5 版。

100 〈高雄商業の施設に拓相満足の意を表す〉，《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0 年 4 月 24 日，第 7 版。

101 〈南洋の邦人子弟を臺灣諸學校に就學 南方諸國の青年學徒も〉，《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1 年 3 月 18 日，第 3 版。

102 〈高雄商業海外に好評 新に二十四名入學〉，《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1 年 3 月 28 日，第 4 版。

名，臺灣人 39 名)，其中 95 名來自臺南州，餘 4 名、1 名分別來自臺中州、高雄州。¹⁰³ 臺北商業學校 1940 年全校 964 名學生中，有 961 名來自臺灣島內各州廳，占 99.69%；另 2 名來自日本內地及朝鮮、1 名來自滿洲支那。¹⁰⁴ 再以臺中商業學校為例，1941 年全校 701 名學生中，有 689 名來自臺灣島內各州廳，占 98.29%；另有 1 名來自朝鮮、1 名來自廈門、10 名來自日本內地。¹⁰⁵ 而新竹商業學校 1941 年第一屆招生 106 名（內地人 54 名，臺灣人 52 名），實際入學 105 名，其中 102 名來自新竹州，餘 2 名來自臺北州、1 名來自臺中州。¹⁰⁶ 亦即，嘉義、臺北、臺中、新竹商業學校的學生幾乎都來自臺灣島內之日、臺籍學生，而高雄商業學校之學生雖也大多來自臺灣島內，但各年度均有不少海外生入學，約占 1 成之多，與臺北、臺中商業學校有明顯的差距。由此可見，學校當局給予住在華南、南洋的日本人子弟免試入學優惠、設置南方教育資金助學的招生政策果然奏效，吸引不少海外生入學。

在畢業生出路方面，自 1941 年 12 月第一屆畢業生走出校門，迄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為止，共計有 6 屆 553 名畢業生（日籍 327 名、臺籍 226 名），以擔任銀行、會社員，以及商店職員居多，也有不少人到華南、南洋發展。¹⁰⁷ 其中，第一屆 70 名畢業生中，35 名於 1941 年 7 月前往菲律賓修學旅行之際，全部內定完成，¹⁰⁸ 就職情況頗佳。1942 年第二屆 92 名畢業生中，以任職企業會社 42 名最多，次為任職銀行 15 名，再次為繼續升學 13 名、

103 臺南州立嘉義商業學校編，《臺南州立嘉義商業學校一覽》（臺南：臺南州立嘉義商業學校，1938 年）。

104 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一覽》。

105 臺中州立臺中商業學校編，《臺中州立臺中商業學校 本校教育要覽》（臺北：臺中州立臺中商業學校，1941 年），頁 54。

106 新竹州立新竹商業學校報國校友會編，《校友會誌——友圖》，創刊號（1941 年 3 月），頁 72-73。

107 李明恭編，《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頁 99-135。

108 〈土産は南方の認識 高雄商業生徒一行比島から歸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1 年 8 月 4 日，第 3 版。

任職官廳 7 名、自營 5 名、赴海外發展有 5 名（佐藤敏男、宮崎文夫、陳季川、廖存惠、林恩火等分別到廣東、海口、上海、廈門、汕頭等地就職或自營商業）、返日 2 名、入伍 2 名、未定 1 名。¹⁰⁹ 1943 年第三屆 96 名畢業生中，以任職企業會社 46 名最多，次為任職軍事機關 17 名、再次為未定 11 名、任職銀行 10 名、繼續升學 4 名、赴海外發展 2 名（鐘謙和赴南方發展、徐文安任職廈門建泰株式會社）、任職官廳 1 名、自營 1 名、其他 4 名。¹¹⁰ 其他各屆畢業生中，也有不少人隨日本勢力所到之處，到望加錫（Makassar，印尼南蘇拉威西省的首府）、昭南（1942 年 2 月日本占領新嘉坡後，將其更名為「昭南特別市」）、納卯、香港、西貢、北平等地工作。¹¹¹ 可見，畢業生之就職情況大致良好，且多能學以致用，協助推進日本的南進國策，成為前進南方的商業鬪士，確實達成該校之設立目標。

再以臺北、臺中商業學校為例，1940 年臺北商業學校 1,740 名畢業生中，以留臺就職者 1,301 名最多（約占 75%），次為返日就職者 154 名（約占 9%），赴華南、南洋就職者僅 23 名（約占 1%）。¹¹² 1941 年臺中商業學校 1,283 名畢業生中，以留臺就職者 1,107 名最多（約占 86%），次為返日就職者 101 名（約占 8%），赴海外就職者僅 29 名（約占 2%）。¹¹³ 可見臺北、臺中商業學校之畢業生均以留臺就職者最多，次為返日就職，赴華南、南洋就職者為數甚少。而高雄商業學校因特別招收住在華南、南洋的日本人子弟，其畢業後返回僑居地就職者不少，光第一屆畢業生赴華南、南洋就職者即多達 35 名，遠超過臺北、臺中商業學校，教育成效卓著。

109 李明恭編，《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頁 105-108。

110 李明恭編，《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頁 111-114。

111 〈南方への志願多し 高雄商業第三回卒業生〉，《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 年 12 月 12 日，第 4 版。

112 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一覽》。

113 臺中州立臺中商業學校編，《臺中州立臺中商業學校 本校教育要覽》，頁 54。

高雄商業學校畢業生除投入職場外，繼續升學者以考入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最多，次為返日就學，進入日本大學、明治大學、拓殖大學，或橫濱高等商業學校、大分高等商業學校等。¹¹⁴ 又，部分學生在臺灣總督府、地方行政官員、學校當局的鼓吹及勸誘下從軍入伍，茲舉數例如下：

一、海軍飛行預科練習生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軍部為加強制空戰鬥能力，乃大幅增額錄取海軍飛行預科練習生。其後，因應戰局惡化，自1943年起招募16-17歲青少年，接受短期速成飛航作戰訓練後即派赴戰場。9月，更將西條八十作詞、古關裕而作曲的「若鷺之歌」作為招募海軍飛行預科練習生的宣傳歌曲，內容描述海軍飛行預科練習生崇仰前輩的熱情。「若鷺」就是年輕的鷺，與那些剛學會飛行的初級學員的形象相吻合，歌曲頗能啟發年青人的壯志豪情。在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標榜之下，年青學子無不躍躍欲試，通過激烈的考試、成為準飛行員，更被視為無上的光榮。

1943年4月，高雄商業學校有上木關朝、佐藤正、雪野正治等3名學生從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取得海軍飛行預科練習生資格。其中，上木、佐藤兩人是海外生，上木是生於菲律賓伊洛伊洛省（Province of Iloilo）的日本人第二代，他說：「我父親30年前到菲律賓伊洛伊洛州從事貿易，從伊洛伊洛省的日本人小學校畢業後進入這間學校，大東亞戰爭爆發時雙親、兄弟都生死不明，但去年六月被皇軍所救的父親終於傳來消息，信中說：『我們被皇軍救出來了。父親和哥哥現在都在軍隊幫忙。皇軍的恩德絕對不能忘記。你也要好好讀書，一定要成為軍人，為了天皇陛下奉獻。不要擔心兄弟們。』因此我下定決心要通過少年航空兵的考試，對抗可恨的美、英，奉獻自己的生命。父母與兄弟要是聽到我考上的榮耀，不知道會有多高興。我已經有了

114 李明恭編，《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頁155-157。

入學後全心全意盡我所能的覺悟。」佐藤則說：「我是從廣東來的，家中有 8 個兄弟。哥哥今年也從本校畢業，報考軍校。父親鼓勵我們全部都成為軍人，所以他要是知道我合格的消息一定會非常高興。我現在充滿著早日開著飛機投身敵陣的心情。」¹¹⁵

1943 年 11 月，高雄商業學校三年級生大八木榮三獲甲種預科飛行練習生合格。他是家中次男，父親是任職於臺灣電力株式會社高雄支店的大八木昭一，有一個哥哥、兩個弟弟、一個妹妹，在五個兄弟姊妹中，他的體格最好，在嚴父的薰陶下，為了成為背負明日之日本的健兵毫不懈怠，現在能一償宿願，成為憧憬的「荒鷲」，不只他本人，全家大小都充滿著感激與歡喜之情。另外，出了「若鷲」的母校高雄商業學校也為他舉辦送行會，校長以下的諸位教師及學友們都衷心地祝福他的出發。大八木榮三同學則表達了他對合格的喜悅與覺悟指出：「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為偉大的戰果而振奮不已的我，終於可以到第一線去抵抗美、英，想到這件事，令我歡喜難抑。我期盼著御召之日的到來，身心都不會懈怠。不過最近從報紙及收音機得知南海最前線戰況十分慘烈，我感到焦急不已，恨不得能早日上第一線與美、英作戰。很幸運地，我從堀江小學校時代以來就很喜歡游泳，身體也鍛練得非常健康，決心志願投身海鷲，犧牲生命為君國奉獻，父母、兄弟也都非常贊成，因此志願報名，只花了 3 天就得到了合格的好消息，實在是再高興不過了。從今以後，我也會不負大家的期待，拼命努力，奉獻一己之事於君國。」¹¹⁶

除上述幾位外，還有櫻井茂、川野典治、中島敏雄、仲程賢介、藤崎恆、森田博彬、石崎辰雄、久保木嘉藏、山本博一、藤井典雄、金野博、山內定

115 〈『同胞の仇を討つのだ』 上木・佐藤・雪野三少年若鷲に合格 高雄商業學校の譽れ〉，《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 年 4 月 2 日，第 4 版。

116 〈學徒に燃ゆ報國の聖火／一日も早く第一線へ 米英必滅に燃ゆる 高雄商業の大八木榮三君〉，《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 年 11 月 11 日，第 4 版。

之、坪谷龍太、柏木信夫、麓龍之助、吉村順治、宗安力、前田盛德喜、山崎進、町田宏、山本昭次、奧田一郎等多名學生於 1943、1944 年先後考取海軍飛行預科練習生資格，從軍報國。另外，也有不少臺籍生，如簡俊六、黃世英、謝泰源、余榮宗、張紹績、莊中和、劉連輝等獲選為海軍特別志願兵，¹¹⁷ 日、臺籍學生皆踴躍投身軍旅。顯示在皇民化的軍國主義教育下，學校當局鼓勵青年學生參加大東亞戰爭，效忠天皇、獻身帝國。

二、陸軍少年飛行兵

1940 年 4 月，日本頒布「陸軍志願兵令」(勅令第 291 號)、「陸軍補充令改正」(勅令第 293 號)等，開始施行少年飛行兵制度。¹¹⁸ 陸軍少年飛行兵主要招募 14-18 歲、小(公)學校以上畢業的少年，他們在錄取後，必須先進入東京陸軍航空學校就讀，接受飛行訓練後才能畢業。畢業後，不但是正式的軍人，還可擔任陸軍伍長，對青年學生頗具吸引力；當然，師長的勸誘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報考十分踴躍，競爭更是激烈。少年飛行兵通常 1 年招收兩次，在臺灣的考試合格，只能算是初試通過，之後還要到東京陸軍航空學校進行複試。通過複試後，才能成為航空學校的學生。初期(1934-1939 年，第一至九期)約招收百數十人到數百人上下；1940 年以後，招收人數開始超過 1,000 人(第十五期 1,305 人)，招收人數最多的是 1943 年 10 月的第十七期(6,430 人)，該期高雄商業學校有廣瀨九州男、金子美隆、大久保十一、金城弘、神田茂喜、渡邊安雄、向野美孝等 7 名學生通過考試，¹¹⁹ 與高雄中學校並列，為軍都高雄的學生爭光。

117 李明恭編，《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頁 152-154。

118 〈御署名原本・昭和十五年・勅令第二九一號・陸軍志願兵令〉，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2469100；〈御署名原本・昭和十五年・勅令第二九三號・陸軍補充令及昭和十二年勅令第六百五十四號(陸軍補充令中改正)中改正〉，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2469300。

119 〈高雄商業から七名／大久保十一君〉，《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 年 10 月 2 日，第 4 版。

其中，廣瀨九州男為日本福岡人，在家中排行第三，大哥利郎已為國犧牲，並進入靖國神社，成為受合祀的新祭神；二哥則加入海軍軍屬的行列，而目前就讀高雄商業學校的九州男，自幼便有志從軍，兄長戰死之事更堅定了他的意志，決心要「報仇雪恨」，在此壯烈的氣魄下提出志願，結果光榮地得到了這份榮譽。將 3 個兒子奉獻給國家而成為歡喜的軍國之家，他們的雙親表示：「我們一直希望 3 個兒子能為國奉獻，這次老三九州男能夠合格真是慶幸，我們終於可以安心了。從利郎戰死以來，『我一定要為哥哥報仇』就成了九州男的口頭禪，現在終於接近報仇的時刻，全家都非常高興。先前收到通知，得知利郎將以新祭神的身分接受合祀，我們歡喜不已，老三能夠合格，更是高興地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大祭之際，我們也想告訴利郎：九州男考上少年飛行兵的事。」九州男則高興地說：「再沒有比這更令人歡喜的事了。戰死的哥哥一定也會為我高興。我已經做好準備要成為了不起的飛行兵，為努力對抗可惡的美、英的哥哥討回公道。」¹²⁰

大久保十一是日本長崎人，當時因罹患登革熱，已經臥病數日，不過得知合格的消息時，很有精神地說：「登革熱都消退了。」接著說：「雖然得了登革熱，不過收到合格的通知太過高興，馬上就不發熱了。我深深沉浸於能夠參加那片晴空下的決戰的喜悅之中。雖然也想在學校讀更多書，不過我覺得這樣會來不及，所以提出了志願。我會拼命努力，成為了不起的人。」金城弘是沖繩人，他說：「8 名兄弟之中，有 6 位兄長前往南方戰場，我也不想輸給哥哥們，一直想上前線與美、英作戰，不過在今年之前都只能等待，心中遺憾不已，現在終於實現了成為『若鷲』的心願，感到無限歡喜。」神田茂喜說：「終於可以在憧憬的天空中征戰，現在我深深感受到生為日本男兒的喜悅。我一定不會辜負父母和老師的名聲，好好地努力。」渡邊安雄說：

120 〈兄は護國の神として 三男は晴の少年航空兵 高雄、喜びの廣瀨氏一家〉，《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 年 10 月 2 日，第 4 版。

「能實現夢想真的非常高興。我曾經做過乘在那雙銀翼之上英勇抗敵的夢，現在已經不再是夢，而接近實現了，令人喜不自勝。我願意奉獻一己的生命於天皇陛下，盡我所能地努力。」¹²¹

由上述學生的採訪內容可知，學校當局的時局教育確實收到一定的效果，學生大多於三年級之際即投身軍旅，原因不外以下數端，一是因愛國心的驅使，效忠君國；二是因家人的期許，甚至是為了已殉難的家人、同胞報仇，因而選擇投效軍旅。另一重要原因，係因這些中等學校學生隨時都有可能被徵召入伍，與其以一、二等兵的低階士兵身分留在臺灣，不如報考陸海軍預備學生或甲乙種幹部候補生，積極爭取成為預備士官，提昇自己的位階。慶幸的是，這些學生取得合格的時間大都已是 1943、1944 年，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後，日本已近戰敗而未被派赴前線作戰，實為不幸中的大幸。

伍、結論

高雄商業學校是在戰時體制時期所成立的一所商業學校，其教育目標、內容及學風等，皆與平時設立之學校有所不同。該校配合日本的南進政策，以養成赴華南、南洋發展的商業人才為目標，為發揮是項特色，除招收臺灣島內學生外，還特別保留部分名額，招收住在華南、南洋的日本人子弟，給予免試入學的優惠，並設置南方教育資金，助其求學。而這些日本人子弟在其僑居地接受小學教育後，往往因當地無日本人的中學而無法繼續學業，因此對於來臺升學之意願頗高，畢業後返回僑居地就業的可能性亦甚高，確實達成培育南方商業人才的宗旨。此一宗旨，亦顯示日本帝國在人才培育上之地域分工性。在「帝國——臺灣——高雄——南方」的延長線上，臺灣是日本前進南方的跳板，在臺灣培育前往南方發展的人才，可說最為經濟而便利。

121 〈高雄商業から七名／大久保十一君〉，《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43年10月2日，第4版。

尤其高雄是向南方發展的鎖鑰，不但是南進政策中最重要的工業及軍事基地，也是南方人才培育的重要中間地。這些住在華南、南洋的青年學生進入高雄商業學校就讀，經施以培育南進戰士的特種教育後，日後可站在南方國策的第一線，在海外活躍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日治之初，隨著日本國勢之高揚，國民意氣風發，青年學子無不懷抱「海外雄飛」的願景，紛紛來到殖民地臺灣尋求發展。從札幌農學校師生大島金太郎、磯永吉、素木得一、三宅勉等，到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濱野彌四郎、八田與一、森山松之助等，無一不是如此，他們離鄉來臺，經過數十載的努力耕耘，終於開花結果，不但開創個人事業成就，更將殖民地各項建設、研究推向高峰。此一「海外雄飛」的願景，隨著日本南進政策的推進，也令臺灣的青年學子躍躍欲試，高雄商業學校即期許其學生懷抱大志，展翅雄飛，「立志開拓大南洋，熱帶各島嶼」，扮演南進的急先鋒。由其歷屆畢業生的就業狀況來看，確實有不少畢業生赴華南、南洋工作或自營商業，協助推進日本的南進國策，成為前進南方的商業鬪士，確實達成設校之目標。

要之，臺灣是日本南進政策的重要跳板，也是培育經略南方人才的中間地，這些人才日後「海外雄飛」，赴華南、南洋一展長才，藉以擴張日本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高雄商業學校之設立及其所培育之南方商業人才，顯然是日本為推進南進政策之一環，雄商青年化作獵鷹、隼鳥，「飛過赤道各國家，且開拓且發展」，將雄商精神充分發揚。事實上，倘再放大到整個臺灣的高等教育、實業教育，由臺北帝國大學、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中高等農林學校，到各農業、工業、商業學校，其教育目標及內容，幾乎都以配合日本國策為目標，其畢業生不但是臺灣產業發展的重要人力來源，也前進日本在南方的占領地，扮演產業開發、軍事前鋒的角色，重要性不言可喻。

參考書目

壹、檔案

《臺灣總督府檔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高雄州商業學校新築費〉。
- 〈土居美水高雄商業學校長事務取扱ヲ命ス〉。
- 〈土居美水高雄商業學校長事務取扱ヲ免ス〉。
- 〈河合讓任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教授〉。
- 〈河合讓任臺灣公立實業學校長、敘高等官五等〉。
- 〈河合讓新竹商業校長〉。
- 〈根來泰信高雄商業校長〉。
- 〈根來泰信任中學教諭、六ノ六、補臺北一中〉。
- 〈根來泰信(任臺灣公立實業學校長，四等)〉。
- 〈實業學校修業年限ノ昭和十八年度臨時短縮ニ關スル件(府令第二三五號)〉。
- 〈林政市任臺灣公立實業學校教諭、敘高等官七等〉。
- 〈五十嵐嘉行(任臺灣公立實業學校教諭、俸給、勤務)〉。
- 〈國枝龍一任實業學校教諭、七等八級、補高雄商業學校教諭〉。
- 〈藤島見了(任高女、高雄)〉。
- 〈佐藤文一(任臺灣公立實業學校教諭、敘高等官七等、八級俸下賜，補高雄商業學校教諭)〉。
- 〈土岐昇(任實業學校教諭)〉。
- 〈井上二郎(任屬；免官)〉。

《臺灣總督府府(官)報》(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 「學徒奉公隊規程」(1942年01月03日)。

「大學學部等ノ在學年限又ハ修業年限ノ臨時短縮ニ關スル件」
(1941 年 10 月 28 日)。

「大學學部等ノ在學年限又ハ修業年限ノ昭和十九年度臨時短縮ニ
關スル件」(1943 年 12 月 25 日)。

《公文類聚》(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台灣教育令中ヲ改正ス」，〈公文類聚・第六十七編・昭和十八年・
第百一卷・學事一・學制・教育費〉。

《太政官・內閣關係》(東京：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藏)

〈御署名原本・昭和十五年・勅令第二九一号・陸軍志願兵令〉。

〈御署名原本・昭和十五年・勅令第二九三号・陸軍補充令及昭和十
二年勅令第六百五十四号(陸軍補充令中改正)中改正〉。

貳、報刊雜誌

《高雄州報》，高雄，1937-1944 年。

《朝日新聞》，大阪，1942 年 10 月。

《臺南州報》，臺南，1938 年。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6 年 6、7、12 月、1937 年 1、3-5 月、1938
年 1、5、8、10-11 月、1939 年 1、3、6、12 月、1940 年 3-4、7、10
月、1941 年 3、5、6-8、11 月、1943 年 4、10-12 月。

《臺灣時報》，臺北，1944 年。

新竹州立新竹商業學校報國校友會編，《校友會誌——友圖》，創刊號(1941
年 3 月)

參、專書及專書論文

一、中文

吳文星，〈日治前期臺灣職業教育之建立與資源之開發：以政策面之分析為中心〉，《第3屆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頁80。

李明恭編，《雄商日治時期史略——創校七十週年特刊》。屏東：李明恭，2008年。

陳黎，〈後記二／臺灣四季，詩歌一事〉，收入陳黎、上田哲二譯，《臺灣四季：日據時期臺灣短歌選》。臺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8年。

劉寧顏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二、日文

入江克巳，《昭和スポーツ史論——明治神宮競技大會と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東京：不昧堂，1991年。

大園市藏，《臺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臺北：新時代社臺灣支社，1942年。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年。

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一覽：昭和14年》。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1939年。

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一覽：昭和15年》。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1940年。

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東京：大空社，1998年9月。

東亞研究所，《日本大陸政策の發展》。東京：東亞研究所，1940年。

近藤正己、北村嘉惠、駒込武等編，《內海忠司日記1928-1939——日本帝國的官僚與殖民地臺灣》。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12年。

星篤比古，《先驅者：ダバオ開拓の父・太田恭三郎伝》。東京：誠美書閣，1942年。

桑原稻敏，《青バットのポンちゃん大下弘：伝説に彩られた天才打者の実像》。東京：ライブ，1989年。

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州立高雄商業學校令規》。臺北：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1939 年 7 月。

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編，《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第一回卒業生記念寫真帖》。高雄：高雄州立高雄商業學校，1942 年。

高雄州商工獎勵館編，《高雄州案內》。高雄：高雄州商工獎勵館，1938 年。

高雄州勸業課編，《高雄州產業概觀》。高雄，高雄州勸業課，1938 年 10 月。

高雄商業學校編，《南方教育資金の現状——御後援を仰ぐため》。高雄：高雄商業學校，1940 年 1 月。

高雄商業學校編，《高雄商業學校諸規程》。臺北：高雄商業學校，1937 年。

臺中州立臺中商業學校編，《臺中州立臺中商業學校 本校教育要覽》。臺北：臺中州立臺中商業學校，1941 年。

臺中商業學校編，《臺中州立臺中商業學校要覽》。臺北：臺中商業學校，1939 年。

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編，《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一覽》。臺北：臺北州立臺北商業學校，1940 年。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編，《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一覽》。臺北：臺北高等商業學校，1937 年。

臺南州立嘉義商業學校編，《臺南州立嘉義商業學校一覽》。臺南：臺南州立嘉義商業學校，1938 年。

臺灣時代社教育部編，《臺灣教育事情》。臺北：臺灣時代社教育部，1937 年。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 年。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1934、1937-1944 年。

三、期刊論文

吳文星，〈始終未能與日人平等共學〉，《日本文摘》，第 100 期（1994 年 5 月 1 日）。

鍾淑敏，〈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以事業補助為中心〉，《臺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4 年 12 月）。

小田梅吉，〈臺灣實業教育の四十年〉，《臺灣教育》，第 400 期（1935 年 11 月）。

邦枝隆，〈台南〉，《あらたま》（1926 年 6 月）。

河合讓，〈フィリピン紀行〉，《南支南洋研究》，第 25 號（1937 年 2 月）。

河合讓，〈南洋各地の教育状態〉，《臺灣教育》，第 435 期（1938 年 10 月 1 日）。

河合讓，〈商業教育〉，《臺北ロータリ—月報》，第 73 期（1938 年 10 月 22 日）。

四、網路資料

〈土居美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址：

<http://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2020 年 7 月 30 日點閱。

王子碩，〈產業與藝術雙棲者——港都的橫山精一〉，《財團法人陳澄波文化基金會》，網址：

<https://chenchengpo.dcam.wzu.edu.tw/showNews.php?aid=158>，2020 年 7 月 15 日點閱。

〈高雄市忠烈祠及原高雄神社遺跡〉，《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

<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advanceSearch/historicalBuilding/20071221000001>，2020 年 7 月 10 日點閱。

〈「高雄歷史常設廳」5/12 開幕，歡迎民眾參觀認識港都文化〉，《臺灣商會聯合資訊網》，網址：

<https://www.tcoc.org.tw/articles/20040512-f5e652ac>，2020 年 7 月 15 日點閱。

〈精神象徵—校徽校旗校歌〉，《雄商校友會》，網址：

<http://teacher.ksvcs.kh.edu.tw/~history/C0204.htm>，2020 年 7 月 16 日點閱。

〈黎剎紀念公園 菲必遊勝地〉，《東方日報》，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824/00176_021.html?pubdate=20100824，2020 年 7 月 18 日點閱。

**Fly To Overseas :
Kaohsiung Commercial School and Japan's
South Forward Policy**

Su-ying Ou*

Abstract

After 1930, Japan's oversea invasion turned to southern Asia with Taiwan as the south-forward base. Kaohsiung, which located in southern Taiwan, was just the origin of south-forward policy. In 1937, after established Taipei and Taichung Commercial School, Japan set up Kaohsiung Commercial School as third one to cultivate commercial manpower to South China and Asia for war-time regime and propelling south-forward policy. To fulfill that purpose and match up south-forward policy, Kaohsiung Commercial School reserved 30 quotas for Japanese from South China and Asia with educational fund and exempt from entry examination. It was just the two special characters deferent from the other two schools.

Notably, as Japan prospered, many youth in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era came to colonial Taiwan for development with vision of "Fly to Overseas", and bore fruits in personal accomplishments and contraction, research in colony after cultivating by decades. With advance of south-forward policy, this vision of "Fly to Overseas" also encouraged Taiwanese youth to be southern vanguard including Kaohsiung Commercial School graduates. Besides, many graduates were well-educated, came from South China and Asia and lived abroad for occupations, which was exactly the outcome that the school aiming at attracting Japanese youth in South China and Asia and the importance compared with Taipei and Taichung Commercial School.

* Senior Researcher, Academic Historica.

Therefore, centering in Kaohsiung Commercial School, this research aims at inquiring its origin, educational purpose, content and relations with south-forward policy, and comparing Taipei, Taichung and Kaohsiung commercial schools which in north, central and south Taiwan in educational purpose and achievements, to comprehend the context of commercial education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era more completely.

Keywords : Kaohsiung Commercial School, KCS, Fly To Overseas, Japan's South Forward Policy, War-Time Regime